



硕士学位论文

MASTER'S THESIS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in Modern Hankou Teahouse

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Master Degre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y

Dai Yasong

Postgraduate Program

Department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upervisor: Luo Fuhui

Academic Title: Professor

Signature _____

Approved

06. 2007



华中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使用授权说明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代亚松

日期：2007年6月6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华中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作者签名：代亚松

日期：2007年6月6日

导师签名：罗福惠

日期：2007年06月07日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发布章程”，同意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CALIS 高校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布，并可按“章程”中的规定享受相关权益。同意论文提交后滞后：☐半年；☒一年；☐二年发布。

作者签名：代亚松

日期：2007年6月6日

导师签名：罗福惠

日期：2007年06月07日



中文摘要

汉口从明朝以来就是长江中游一个重要的商业城镇。鸦片战争之后不久,逐渐从一个传统的商业城镇转变为一个近代化的商业城市。作为城市公共生活娱乐空间之一的茶馆成为研究近代汉口文化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窗口和视角。本文通过对汉口茶馆的发展概况、汉口茶馆文化的积累与形成、汉口茶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等方面,来分析、重构近代以来汉口人的文化、社会与生活,让近代汉口历史呈现为一出鲜活的生活文化史。

汉口最早的茶馆在后湖一带,是汉口市民的休闲之地。1861年汉口开埠之后,茶馆的数量、规模发展更加迅速,一些汉口人喜爱的文明或不甚文明的娱乐活动如斗蟋蟀、赌博、下棋、玩鸟等也多在茶馆中进行,茶馆成为汉口人一个丰富的生活空间。

茶馆与曲艺都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很多地方曲艺进入汉口之后也选择茶馆作为生存和传播之地。近代汉口茶馆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曲艺艺术形式,如湖北小曲、湖北花鼓戏、汉剧、京剧、评书、善书、大鼓、皮影戏、木人戏都曾以汉口的茶馆作为演出场所,茶馆与江湖艺人相依相偎的利益关系使茶馆成为世俗文化的保存和传播空间。

在清末民国时期的茶馆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交易场所,许多行业的商人以茶馆作为进行交易的场所,形成独特的茶馆商业文化。民国时期武汉青洪帮茶馆的控制与影响,又在茶馆中形成了带有秘密政治特点的帮会文化。

茶馆也成为各种势力竞相控制和改造的场所。一方面是传统帮会势力的控制,大部分茶馆都具有着帮会背景;另一方面民国政府和政治精英们努力对茶馆进行改造,希望籍此能加强对汉口市民的教化和思想控制;茶馆业又形成了自身的管理组织——茶馆业同业公会,企图形成一种独立自治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这种公共领域的构建又成为一种幻想。

总之,对汉口茶馆的前世今生、汉口茶馆文化的探讨,一方面丰富了人们对汉口历史的想像,另一方面又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开阔的视野空间,丰富了近代史的研究。

关键词: 汉口茶馆、茶馆文化、公共空间、文化社会生活



Abstract

Hankou is in the Yangtze River and Hanjiang River crossroads, and has been an important commercial tow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the Ming dynasty. Soon after the Opium War, Hankou changed from a traditional commercial town to a modern commercial city. And this change impacted modern Hankou's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As one of the city public life and entertainment space, the teahouse has become a kind of window and perspective in studying modern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reconstruct modern Hankou's cultural, social lif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Hankou teahouse, accumulation and form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being transformed as a public space. And this paper will show modern Hankou history for a lively cultural history of life.

The first teahouse in Hankou was foun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Back lake. After 1861, the number and size of the teahouse developed more rapidly. Some popular civilization or not civilizatio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gambling, playing chess, playing birds were also conducted at the teahouse. The teahouse became a Hankou persons' rich life space.

The teahouse and the local art have one kind of natural relation. Many local arts after entering Hankou selected the teahouse as land of survival and spread. Many and varied acrobatics artistic forms appeared in the modern Hankou teahouse. Hubei songs, Hubei Huagu opera, the Peking opera, the storytelling, the rare book telling, the big drum, the shadow play, the puppet show had the teahouse as performance place. The benefi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eahouse and the itinerant performer made the teahouse become the place of common custom culture preservation and dissemination.

Many profession merchants carried on the transaction in the teahouse and formed the unique teahouse commercial culture. Republic of China time, Wuhan Blue Hong gang secret society controlled and influenced the teahouse, and formed the secret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 gang culture of teahouse.

The teahouse also becomes the place which each kind of powers wanted to control and transform. On the one hand is the traditional gang influence controlling, the majority of



teahouses all were having the gang backgrou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al outstanding people diligently carry on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teahouse, they hoped strengthens to the Hankou resident's enlightenment and the thought control. The teahouse industry had formed ow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 Teahouse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 wanted to form one kind of autonomy bourgeoisie public domain. But as a result of Chinese society's complex, this kind of public domain construction became one kind of fantasy.

In a word, the discussion about Hankou teahouse previous generation this life, the teahouse culture, have enriched the Hankou history imag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 , this discussion also provide the open field of vision and space for the rigorous scholarly research about modern China history.

Key words: Hankou , Teahouse culture, Public space,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目录

中文摘要	i
Abstract	ii
导 言	1
一, 研究的目标、内容、意义	1
二,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4
三, 文章主要内容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汉口茶馆的概况	9
第一节, 早期汉口茶馆的概况	9
第二节, 近代汉口的茶馆	17
第二章 汉口茶馆文化	22
第一节, 汉口市民的生活空间	23
第二节, 茶馆中的世俗文化	29
第三节, 近代汉口茶馆里的商业文化	40
第四节, 茶馆里的秘密政治——茶馆里的帮会文化	41
第三章 茶馆——作为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	43
第一节, 帮会势力对茶馆的控制	44
第二节, 政府对茶馆的改造——思想文化的占领	47
第三节, 茶馆业的自身管理——汉口茶馆业同业公会	49
结 语	53
参 考 文 献	55
附录	58
后 记	60



导 言

一、研究的目标、内容、意义

茶馆,简单来说就是市镇中集体饮茶的场所。所谓茶肆、茶坊、茶楼、茶园、茶室,虽然名称各异,但内涵大体和茶馆相仿。

茶馆的产生,与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市民阶层的形成密切相关。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在城镇中产生了一个数量较大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与居于城镇中的文人官吏和居于乡村中的农民不同,主要包括活跃在各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等。这些人生活在城市之中,比邻而居,街市相见,但又不具有类似乡村社会中的血缘和亲族关系。商品贸易的发展促使他们相互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系,茶馆作为一种彼此沟通和联系的场所也就应运而生。^①

茶馆的产生,同时也是茶文化向下层民众的拓展。饮茶是中国人的传统,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在汉代已有了饮茶的现象,西汉时期贵族饮茶成为时尚,魏晋南北朝时代饮茶已为广大普通文人所喜好。^②茶馆的产生,则是茶文化从贵族文人向下层普通民众渗透之后的产物。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茶馆产生于唐朝,唐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僧人因学禅“务于不寐”而煮茶提神,以致“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是有关茶馆的最早记录,这个时期的茶馆还只是少量存在于一些市镇中。

茶馆在城镇中的普及是在宋代,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东京(现在的开封)朱雀门大街“以南东西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旧曹门街的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往往夜游,吃茶于彼。”《水浒传》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中写到:“那清风镇也有几座小勾栏并茶房酒肆。”在发达的商业城镇中,茶馆、教坊、勾栏、酒肆林立,成为人们休闲游乐的空间。这时除茶坊之外,还有提壶往来叫卖茶的人,属于一种流动的茶坊,如在杭州城内就有一

^① 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7年第三版,第206页

^② 王玲:《中国茶文化》,参看第一章《两晋南北朝士大夫饮茶之风与茶文化的出现》,谈到了中国最早有关茶的文献记载汉人王褒“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的《僮约》,后来如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分别从药物和文字语言角度谈到了茶。邓子琴的《中国风俗史》谈到魏晋清谈之风的后期也出现了许多清谈家以饮茶代酒作为助谈的手段,出现了“以茶养廉”的情况。



种流动的茶担、茶摊，称为“茶司”，服务对象为普通民众。

宋代茶坊大多实行雇工制，茶肆主招雇熟悉烹茶技艺的人，称为“茶博士”，进行日常营业。茶博士是城市职业中专业化较强的技术雇工。

宋代茶馆的功能从单一的生理上的解渴功能转而具有了社会功能，成为人们生活和娱乐空间的一部分。一些茶馆除了提高茶水的品质之外，开始注重空间的陈设，娱乐节目的安排，以招揽不同层次的茶客，具有了自觉的服务意识。如《梦梁录》记载当时杭州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大茶坊更是富丽堂皇，讲究文化装饰，营造品饮环境，吸引具有较高生活和文化品位的官僚文人，诗人苏东坡就有“尝茶看画亦不恶”的诗句。还有一些茶馆向世俗方面发展，提供种种民间戏曲小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弦歌。茶肆中的弦歌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雇用乐妓歌女，这是茶肆招揽顾客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是茶客专门来此种茶肆学乐学唱，《梦梁录》“茶肆”条云：“大凡茶楼多有富贵子弟、诸司下直等人聚会，习学乐器。”再是安排说唱艺人说书，还有博弈下棋等活动。茶馆除了供应茶水外，也开始供应茶点。^①

元明茶馆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明末张岱《陶庵梦忆》卷8记载：“崇禎癸酉，有好事者开茶馆。”^②这是“茶馆”一词的第一次出现。

清代茶馆发展达到鼎盛，呈现出集前代之大成的景观，数量多，种类、功能蔚为大观。当时杭州城有大小茶馆八百多家。太仓的璜泾镇，全镇只有数千家居民，而茶馆就有数百家。

传统的茶馆也有简单的分类，如以卖茶为主的茶馆，北京人称之为清茶馆，环境优美，布置雅致，茶水优良，兼有字画、盆景点缀其间。另有荤铺式茶馆，即卖茶，也兼营点心、茶食，甚至有的茶馆还备有酒类。所卖食品多为特色小吃。

宋元之时已有戏曲艺人在酒楼、茶肆中做场，及至清代才开始在茶馆内专设戏台。包世臣《都剧赋序》记载，嘉庆年间北京的戏园即有“其开座卖剧者名茶园”的说法。后来茶园、戏园的说法就合二为一。梅兰芳有一段话：“当年的戏馆不卖门票，只收茶钱，听戏的刚进馆子，‘看座的’就忙着过来招呼了，先替他找好座儿，再顺手给他铺上一个蓝布垫子，很快地沏好一壶香片茶，最后才递给他一张也不过两个火柴盒这么大的薄黄纸片，这就是那时的戏单。”^③说明了当时茶馆与戏剧的结合方式。

茶馆在其发展历史中，早已超越了最初供众人饮茶的简单功能，具有了复杂的

^① 刘清荣：《宋代茶馆论述》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② 徐晓村主编《中国茶文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

^③ 连振娟：《茶馆的前世今生》载《文史博览》2006年第3期



社会功能。它不仅是人们的消闲娱乐喝茶会友的场所，同时也是商人进行交易、小商小贩谋生的场所，常常也成为人们发表言论批评时局、传播信息的中心，不仅是人们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也深入到了文化空间和政治空间，成为一个城市社会变迁的展示舞台，各色人物围绕茶馆发生的内部与外部的联系与冲突，往往在背后代表着城市中各种势力的争斗。近代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谈到茶馆时说：“茶馆是个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①他的话剧《茶馆》，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描写了发生在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人们社会生活。同时茶馆的存在，也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何理解茶馆空间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茶馆文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汉口作为长江中游的一个商业城市，即不同于上海、广州等近代以来及早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的沿海城市，也不同于如成都这种风气较为保守的内陆城市。它位于汉水与长江相汇之处，清朝以来就是商业重镇，在传统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61年汉口开埠，又将汉口抛入到了一个经济与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一面接受着欧风美雨的洗礼，一面又在传统文化中挣扎，是长江中游沿江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

汉口的茶馆也同样在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作为传统的市民休闲娱乐场所，一方面发挥着传统的娱乐休闲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市民思想观念、政治观念等的改变，茶馆的功能也变得更加复杂。新式娱乐场所如戏院、综合性游乐园、跑马场等的出现，也迫使传统的茶馆进行革新，同时作为一个传播市井文化的场所，茶馆的文化功能越来越受到市政管理者和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们的注意，于是又出现了对茶馆的改造。汉口的茶馆与近代的秘密帮会关系密切，汉口有一句俗话叫作“不是光棍，不开茶馆”，这些帮派把茶馆作为他们处理帮中事务、秘密接头联络的场所，从而又形成了一套茶馆中的帮会文化。

茶馆的建筑、位置，茶叶和茶具，行走在茶馆中的茶博士们的职业情趣，茶馆和民间曲艺如楚剧、皮影戏、评书等的关系，这些都是研究汉口甚至中国茶馆的题目。

因此，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舞台之上，小小的茶馆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茶馆之中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冲突，还是围绕茶馆所产生的种种文化现象，以及在茶馆之外出现的种种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争夺，都可以以小见大地看到一个城市区域的变化。这也是我决定对汉口茶馆进行研究的意义所在。

^① 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茶馆的舞台艺术》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第183页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中国有很久的饮茶传统，茶馆的历史从宋朝以来也已延续了近千年，但是对茶馆及茶馆文化的综合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却很少。其原因在于：一，长期以来历史学者们都把眼光集中到了社会上层的变化和精英文化的变迁，茶馆被作为一种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场所而抛入历史学研究的废弃角落，从而忽略了其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功能；二，主要是研究史料的缺乏，正史记载很少，如王笛对成都茶馆的研究，所使用的史料除了传统档案之外，还涉及到了民间歌谣、文学作品等等以往认为非正统的史料。

根据我所看到的论文和相关的介绍，中国茶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成果。

1. 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茶馆的研究

对茶馆做整体研究的有连振娟的《茶馆的前世今生》，从茶馆的产生、发展以及在清朝时的繁盛，对茶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论述。指出了茶馆的产生与佛教禅宗的关系，市镇茶馆与市井文化的纠缠，清代茶馆与戏曲的结合，一种新型的娱乐空间——茶园（边喝茶边欣赏戏曲）的出现及与茶馆的继承关系。^①

阎红生的《清末民初的茶馆》，通过对江浙一带茶馆中经常活动的人群，包括商人、一般公务员、各色民间艺人的考察，对茶馆的商业贸易功能、休闲娱乐和传播文化的功能进行了描述。同时对于民国时期出现在茶馆中的赌博、吸食鸦片、卖淫、帮派势力的渗入、吃讲茶的民间习惯，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②

以某一城市或地区的茶馆作为研究对象，有赵映林的《民国时期的南京茶馆》，对南京茶馆中茶馆独特精湛的冲茶技艺、应付地痞流氓的应变能力给了有趣的描写，并以义顺茶馆、奎光阁茶馆、六朝居茶馆和新奇芳阁茶馆作为代表，对南京不同类型的茶馆进行了论述，从茶馆中的各种民间艺术、戏曲文化出发，他认为民国南京夫子庙一带的茶馆文化代表了民国时期南京茶文化的一个层面。^③

王龙志的《南昌新旧茶馆文化》对南昌不同时期茶馆文化的考察。^④

以某一时间段的茶馆作为研究对象，有刘清荣的《宋代茶馆论述》，宋代是我国茶馆业发展的第一个兴盛期。茶馆具有数量多、规模大，分布地域广的特点。而

^① 连振娟：《茶馆的前世今生》，载《文史博览》2006年第3期

^② 阎红生：《清末民初的茶馆》，载《民国春秋》1997年第2期

^③ 赵映林：《民国时期的南京茶馆》，载《钟山风雨》2006年第3期

^④ 王龙志：《南昌新旧茶馆文化》，载《农业考古》2006年第2期



丰富多彩的经营特色又彰显了宋代茶馆的丰富内涵。这种繁盛的原因，一是城市商业经济高度繁荣的产物，二是宋代茶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的饮茶习俗和唐代茶馆的发展密切相关。^①

宋毅彬、姜含春的《中国现代茶馆发展初探》，从中国一千多年的茶馆文化发展入手，对中国现代茶馆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现代茶馆的概念、特点和功能，并对中国现代茶馆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②

对茶馆文化的其它方面研究。有潮龙起的《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从茶馆与近代帮会的关系出发，对茶馆在帮会中的功能：往来交接、信息传达、组织传播和日常娱乐进行了考察，并着重描述了茶馆中出现的帮会文化：独特的手势、隐语、茶诗、茶碗阵等。指出了帮会具有落后的封建性和较强的经济互助性。^③

2, 对茶馆尤其是近代茶馆社会功能的研究

朱小田的《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近代江南乡镇中的茶馆，提出了乡镇茶馆在整个近代乡村社会的运作中，具有乡村市场的节点、社会政治的焦点和闲暇生活的热点等三个特点与功能。在茶馆中，商人以贸易洽谈、直接贸易、信息猎取的方式从事商事；乡镇政治、吃讲茶、继替政治等等。以此认识到茶馆在近代乡镇中的作用和对建设现代化小城镇的启发。^④

牛力的《试论近代中国茶馆的社会功能》，他认为近代中国，茶馆与民众生活紧密相连，承担着广泛而复杂的社会功能。茶馆作为经济生活的空间，民间纠纷调解的重要场所，社会信息传播的集散地，控制舆论的力量。同时他也认为，茶馆的这些功能正是近代民间社会内在运作逻辑的体现。^⑤

3, 把茶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一种进行的研究

1974年，日本学者竹内实的著作《茶馆》问世，不过该书实际上是对中国的风土介绍，讲茶馆的只有其中一节。铃木智夫1982年发表的关于清末江浙地区茶馆的论文，第一次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了茶馆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茶馆、顾客、“吃

^① 刘清荣：《宋代茶馆论述》，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

^② 宋毅彬、姜含春：《中国现代茶馆发展初探》，载《中国茶叶加工》2006年第2期

^③ 潮龙起：《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④ 朱小田：《近代江南茶馆与乡村社会运作》，载《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

^⑤ 牛力：《试论近代中国茶馆的社会功能》，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



讲茶”、赌博等现象都有所论及，^①次年他又发表了以清末上海茶馆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清末上海の茶館について》。之后，西泽治彦发表了两篇关于茶馆的论文，1985年以全国茶馆为研究对象的《飲茶の話》和198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成都茶馆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因为都受到资料的限制而没有深入展开。^②

王笛对四川成都茶馆的研究。近几年，他从城市公共生活空间的角度展开了对四川成都的一系列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了数篇论述成都茶馆的论文。国内我见到的较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发表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的《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该篇论文给我们讲述了茶馆之内的市民生活情景，发生在茶馆中的经济活动、民事纠纷，阶级鸿沟和社会歧视，公开的社会政治和秘密的帮会政治，政府与精英对茶馆的控制与改造和民众对其改造与控制的反抗。把茶馆作为一个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与城市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另一篇是收录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论集》里面的一篇文章《茶馆、茶房与茶客——一个近代中国内陆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微观研究》，与上篇不同的是，这是一篇对成都茶馆的数量、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茶房的技术、劳动环境及工资和茶客发生在茶馆中的日常生活的综合性考察的论文；对茶馆文化和发生在茶馆中的政治也进行了论述。

刘风云的《清代的茶馆及其社会化的空间》，从茶馆作为大众化的社会空间的角度对清代城市中的茶馆的考察，认识到茶馆在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角色，由于茶馆带有街头文化的一些特征，所以它常常与代表下层民众的市井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市井文化的娱乐性和消闲性也在茶馆中得到充分的挖掘和体现，使茶馆成为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③

其它的则还有李晓南的《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看今昔茶馆文化的变迁》，试图从茶馆的区位条件、规模、空间形态与氛围、时间预设、身份预设和行为预设等方面，来考察传统茶馆与当代茶馆文化的变迁。^④

4. 对汉口茶馆以往的研究成果

查阅关于汉口茶馆的相关资料，除了《汉口丛谈》、《汉口竹枝词》、《汉口

^① 铃木智大：《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载《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② 王笛：《茶馆、茶房、与茶客——一个近代中国内陆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微观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292-293页

^③ 刘风云：《清代的茶馆及其社会化空间》，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④ 李晓南：《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看今昔茶馆文化的变迁》，载《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1期



小志》等对汉口早期茶馆的史料性记录和文学性描写之外，尚未发现有对汉口茶馆进行系统性叙述和讨论的论文。

关于清末和民国时期的茶馆，有发表在《武汉文史资料》第十八辑田梅村的《旧时代武汉茶馆见闻》和第十九辑龙从启的《也谈武汉的茶馆》，袁素娣的《茶馆撷趣》，许智主编《硚口史话》中的一篇《汉正街上话茶楼》^①，王登福主编《汉口史话》中的一篇《汉口的茶馆》^②，这些文章只能作为史料和介绍性文字来使用，不能称得上有学术价值的论文。

涉及到汉口茶馆的论文，傅才武的博士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第二章第五节《汉口的茶馆》，该节目的主要是谈论汉口茶馆与曲艺的关系，同时也谈到了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社会功能，但是所谈甚略，主要引用的史料就是上面的那篇《也谈武汉的茶馆》，对汉口近代化之前汉口茶馆的情况没有谈到。^③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 2004 年硕士生江霞的硕士学位论文《明清及近代武汉游憩地研究》，第二章《清前期——汉口开埠前的游憩地》中谈到了清朝时期后湖一带的茶馆，但主要是放在“后湖”这一个地理区域之中的研究，开埠后对传统游憩地茶馆的变迁也略有论述。^④

其它的有冯祖祥、姜元珍的《湖北茶馆》，雷友山的《浅谈武汉茶馆的过去与现在》等论文与文章中，对近代汉口茶馆有所论述。

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专门的论文或著作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对汉口茶馆进行研究。

三，文章主要内容及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本篇论文拟将汉口的茶馆做一综合性的研究：

首先，以时间为线索，对汉口从建镇以来的茶馆做一个脉络性的总结，并结合各个时期的城市社会、经济状况作一简单的叙述。

其次，对汉口茶馆文化进行专题性研究：如汉口茶馆中的俗文化，帮会文化等。

第三，近代茶馆（主要是清末民国时期）内的日常生活、地方政治与公共空间。从公共空间的角度论述在新的时期茶馆功能的变化，以及发生在茶馆内外的社会控制与冲突。

^① 许智主编《硚口史话》，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93-296 页

^② 王登福主编《江汉史话》，武汉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423-428 页

^③ 傅才武：《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华中师范大学 2004 年博士毕业论文

^④ 江霞：《明清及近代武汉游憩地研究》，武汉大学 2004 年硕士毕业论文



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第一, 以时间线索的综述: 汉口早期茶馆与近代茶馆, 并通过比较研究来描述汉口茶馆的历史变化。

第二, 专题性的研究: 茶馆与俗文化, 茶馆与帮会生活。

第三, 公共空间的理论: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是近几年来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社会学理论的尝试, 王笛对成都茶馆与街头文化的研究、李德英对成都公园的研究、熊月之对上海张园的研究, 都是一个很好的先例。这种转向一方面表明了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结合,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对历史研究的方向从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民众文化的转向。

茶馆作为一种城市的公共空间, 同样存在着一种社会的冲突, 控制与反控制, 帮会对汉口茶馆的把持, 民众对茶馆娱乐休闲功能的坚持, 市政管理部门对茶馆的改造(如民国时期建立五个民众茶园)来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等等。



第一章 汉口茶馆的概况

第一节，早期汉口茶馆的概况

1. 汉口镇的形成与发展

汉口的名字，由来已久，作为地名，远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见诸史载。南北朝之齐中兴元年，萧衍进驻武汉地区，曾亲自领军进克汉阳鲁山（今日的龟山），“筑汉口城以守鲁山”。这是迄今所知史书中最早出现的汉口地名。但此时的汉口仍然属于汉阳境内。^①

汉口镇在地理上的真正形成，得益于明朝成化年间（1465-1470 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发源于陕西北大巴山系的嶓冢山，之后自西北向南流入湖北境内，《禹贡》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②明成化之前，主河道在今武汉市汉阳区龟山南麓注入长江，汉口与汉阳连为一体。成化年间，汉水突然改道，转从龟山北麓进入长江，故河道淤塞，汉口与汉阳出现了天然界线，汉口镇真正形成独立的地理位置。

“盖汉口初一芦洲耳，洪武间，未有民居。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③根据唐裔潢《风水论》中的记载，汉口原先乃是一片低洼的湖塘、河滩，长满了芦苇，不适合人居住。到了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才有张姓父祖到此盖房居住。明嘉靖四年对汉口的调查结果，当时汉口上岸有张添爵房屋五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房屋六百五十一间。1535 年，在汉口通判袁焞的倡议下，沿着汉口的内缘修建了一道绵延 20 英里的堤防，有效防御了来自后湖的洪水灾害，也极大推动了汉口之后的发展。随着居民不断增加，汉口设立了四个居民聚居区——坊：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当时居民达 1395 户，按每户 5 口计

^① 皮明麻、吴勇：《汉口五百年》，此书也提到不同的观点，如杨铎先生在其著作《汉口今昔考》中认为汉口城不在汉阳境，而是在黄陂县加湖之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第 2-3 页

^②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 卷一 第 9 页

^③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卷一 第 59 页



算, 汉口居民已达 7000 人。^①

汉口镇的发展和繁荣, 得益于汉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顺治年间的学者熊伯龙就已经提出, 汉口乃是“九省通衢之地”。乾隆时修撰的《大清一统志》也指出: “汉镇适当五达之衢”。范楷在《汉口丛谈》中也多次论及汉口为“地当天下之中”、“七省要道”、“九省通衢”。^②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 促成了汉口成为一个商业重镇。明神宗万历年间, 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口岸, 并成为“楚商行盐”的总口岸, 淮盐的集散地。虽然汉口在明朝末年曾经遭受战火的破坏, 但恢复的很快, “当地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把清初看成是汉口成为一个国内著名商业中心的大体上的起点。”^③

一些明末清初学者的文章诗篇中, 曾记载了汉口在该时期的繁盛景象, “巨镇水陆冲, 弹丸压楚境。南行控巴蜀, 西去连鄢郢。人言杂五方, 商贾富兼并。纷纷隶名藩, 一一旗号整。骈骈驴尾接, 得得马蹄骋。俦俦人摩肩, 蹙蹙豚缩颈。群鸡叫唳喔, 巨犬力顽犷。鱼虾腥就岸, 药料香过岭。黄蒲包官盐, 青箬笼苦茗。”“市声朝喧喧, 烟色昼暝暝。一气十万家, 焉能辨庐井。”“朱甍十里山光掩, 画‘舟益’千樯水道遮。北货南珍藏作窟, 吴商蜀客到如家。”“十里帆樯依市立, 万家灯火彻宵明。”^④

虽然汉口在明末遭受战火的破坏, 但在清朝初期很快就又恢复了重建, 并被称为“天下四镇”之首。到了鸦片战争之前, 汉口的码头时常停泊着成百上千艘的货船, 盛况远远超过了明代。清代以来, 除淮盐、粮食、竹木成为汉口市场交易的大宗, 纺织品、茶叶和棉花同样在汉口镇不断流转交易, 以至汉口港被时人称为长江之上的“船码头”, 到了近代, 又有了“东方芝加哥”的称号。可见汉口在清朝以来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繁盛的景象。

汉口镇的崛起, 使其成为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水运交通枢纽, 各地商人云集汉口, 汉口人口也在不断增加,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19 世纪是汉口开始进入人口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 1800 年汉口人口约有 100 万左右, 19 世纪中期达到 150 万, 之后由于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人口下降, 但是到了 1890 年前后, 又恢复到了 100 万上下。^⑤

^① 皮明麻、吴勇:《汉口五百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第 13 页

^② 皮明麻、吴勇:《汉口五百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第 11 页

^③ [英]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37 页

^④ 查慎行《敬业堂集·汉口》、潘耒《遂初堂集·汉口》、吴淇的诗, 见《汉口丛谈校释》第 426-427 页

^⑤ 关于汉口人口在 19 世纪发展的情况, 可参看罗威廉《汉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51-53 页



随着汉口镇的发展,作为城市服务业一种的茶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内容。

2, 早期汉口茶馆的概况

汉口最早的茶馆,究竟始于何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无从考察。我们只有从清朝文人墨客留下的零乱的描述汉口盛况的诗篇中建构一个大概的情况。

后湖茶肆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长期旅居于汉口的一位商人兼文人在他的一本关于汉口镇的小册子中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早期茶馆情况的宝贵资料。在他的书中有一段说:“后湖之有茶肆,相传自湖心亭始。近若涌金泉、第五泉、翠芴、惠芳、习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皆在下路雷祖殿、三元殿后。其余尚有数十处……”^①这本小册子成书于道光癸未三年,即公元1823年,正是鸦片战争的前夕。这一段话一方面说明,对于汉口最早的茶馆起源于何时,作者也不甚了解,起源的地点可能是在后湖的湖心亭^②一带,不过也只是传说,并没有确切的证据。

后湖一带在汉口历史上非常有名。根据一些资料的记载,后湖的形成源于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水改道后从龟山北麓入江,在此之前汉水入江的一条支流逐渐淤塞,形成处长形湖泊,称为后湖,也称为潇湘湖或黄花地。袁公堤修建之后,这一带地势较高,人烟稀少,景色优美。再加上堤内人口不断增加,地价昂贵,很多人纷纷来到后湖一带,盖房造屋,修楼建馆,到了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这里已成为汉口市民和游人休闲游乐的好去处,茶馆酒楼、妓院乐坊应运而生,“后湖一带,地平而旷远,春草生时,望无涯涘。加之茶寮市列,争购名花,春兰秋菊,各擅其芳。以是骚人逸士,估客寓公,无不流连光景,呼茗悃留。”^③一时间热闹非凡,曾被时人称为“销金锅”,正所谓“后湖亦是销金锅,鱼龙百戏相婆娑。游观士女纷如织,茶坊无日不笙歌”^④,说的就是当时后湖的景象。据清嘉庆年间《汉阳县志》所记载的后湖“湘湖八景”中,“茶社歌声”被列为其中之一,由此可知茶馆在后湖一带的繁盛。^⑤

道光年间后湖一带茶馆的数量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保留下来,上引一段文字

^①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80页

^② 今日的位置约在满春路、中山大道一带,已废

^③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106页

^④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72页

^⑤ 所谓湘湖八景:晴野黄花、平原积雪、麦陇摇风、菊屏映月、疏柳晓烟、断霞归马、襄河帆影和茶社歌声。参看《汉阳县志》



中提到,除了有名的几家茶馆之外,“其余尚有数十处”。与范楷同时代稍后的一位居于汉口、愤世嫉俗的文人在他吟咏汉口市井生活的“竹枝词”中关于后湖的茶馆数量也有大约的数字记载:“茶坊前后两层,共计十余家,惟涌金泉有楼。”^①根据两人的记载,可知在清朝中期后湖一带的茶肆大约在 10—20 家之间。汉口沿江市区一带茶馆的数量应该也不会少,如该书第三十七首吟咏市阛的诗句中写到:“无数茶坊列市阛,早晨开店夜深关。”^②

后湖一带风景优美,四时景色变化不同,所谓:“春来麦草秀成行,夏日盈畴菹菜香。更有冬来黑白菜,移根不肯向他方。”^③既有优美风景,又不失田园风光,当然会成为富商巨贾、文人骚客、市井民众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早期汉口镇后湖一带有名字记载下来的茶馆有:涌金泉、第五泉、翠芽、惠芳、习习亭、丽春轩、白楼、早逢春、忘湖泉等。

白楼:白楼位于后湖的上路一带。“白楼者,白氏之故址也,在大观音阁后,百弓地辟,畚土坚(土侵),编槿为篱,积石成径。中构小楼,作东西两箱。轩窗豁达,槛曲廊回之内,皆设小座,以供茗坐。”^④后湖上路一带指的是后湖的西北一带,这里开发较晚,所以人烟较少,不如下路湖心亭一带热闹。但也正因为这样,白楼茶肆成为欣赏风景、文人雅集^⑤、酝酿情绪的好地方。坐于楼上,向外观赏风景,则可见到“远山几抹,隐隐青露。朝云暮霞,眩人眼目。”^⑥到了盛夏时节,湖水涨于堤平,夕阳西下,华灯初上,烟波浩淼,凉风袭人,灯光倒映于湖水之中,寂静中又传来捕鱼之声。于此情景,坐于楼上,佳茗细品,七碗香生,忍不住就要歌以咏志,聊发文人之狂。

白楼也成为很多旅居汉口的商人排遣乡愁的地方。汉口是一个商业城镇,居民多为从各地汇聚而来的商人,正所谓“本乡人少异乡多”。除了借酒浇愁之外,到茶馆喝茶饮茗,也成为一种排遣乡愁的方式。道光年间的这位客商就常常于夕阳西下,带上好友相约白楼淪茗,吟诗作句,以遣客愁。^⑦严格的讲,白楼并非纯粹的茶馆,或可称为酒茶馆或茶酒馆,因为在白楼之上也可饮酒,“是秋八月,林琴庵携酒白楼,相招看月”^⑧由此推测,在白楼之上除了经营茶水之外,应该还存在着

^①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76 页

^②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27 页

^③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73 页

^④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78 页

^⑤ 雅集是中国传统文人聚会的一种方式,据说三国时期的邺下聚会开了中国文人雅集的先河,清中后期居于汉口的文人雅士常以茶馆作为雅集之所。

^⑥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78 页

^⑦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92 页

^⑧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97 页



酒菜的经营。

涌金泉：位于后湖一带，位置高朗，根据范楷的记载，在后湖一带发水的时候，所有的茶社和酒楼都被淹没在水中，唯有白楼和涌金泉安然无恙。涌金泉也是一个在品茗的同时登高望远、欣赏风景的好地方。“要吃清茶兼望远，楼高须上涌金泉”，^①登楼四眺，向北可见风火、木兰二山；西南则为汉阳之三山：仙女、楼子、马足；向南则是大别当前，大别山上寺院庙宇、晨钟暮鼓，与此情景，静坐试茶，又有脱离俗世之感；向东为大江横绕，樯立帆飞，烟雾浩淼。

早逢春、望湖泉：两茶馆相毗邻，茶馆中除了喝茶之外，还可欣赏丝弦小调，民间戏曲。“清茶寂寞殊无味，要听丝弦怕熟人。能使两难成两美，地方最好早逢春。”^②望湖泉后改名为“络石泉”，是当时夜茶生意非常好的地方，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卖唱女子在此演唱。“金凤阿香都妙绝，就中第一简姑娘”，^③简姑娘，陈姓女子，是当时一位较为出名的歌伎，修眉广额，长相秀美，声音舒展圆韵，神情气息完美，有“金石音，而无脂粉气”。被称为当时歌院的魁杰。

第五泉：后湖茶肆中非常出名的一家。主人姓李，爱好书画，收藏有徐青藤（徐渭）、八大山人（朱耷）、高淡游、查二瞻（查士标）、青溪（程正揆）、石溪（髡残）等的真迹，并且常常把这些书画挂于茶室墙上，供品茶人欣赏。不仅显示出主人不俗的品格，更是一种经营的方式，吸引具有同样趣味的顾客光临。到这里喝茶又别有一番风味，如黄谷原在他的诗中就写道：“散步不知远，频来第五泉。品茶贪野趣，读画忆高贤。”^④在这里喝茶品茗，不仅可以欣赏到原野风光，还可以在品赏墙壁上高人书画的同时追忆前代圣贤才子的风流与才华。第五泉同样是一个领略烟波之趣的好地方，叶调元赋诗写道：“夏汛初看几尺添，平湖万顷镜中天。倚栏领略烟波趣，位置无如第五泉。”^⑤

市井茶肆

汉口袁公堤以内到汉江边界，为汉口镇的主体，也是人烟稠密之处，汉口镇的主要居民都居于此处，主要的货物交易也是在这里进行。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清政府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设置了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市井之中的茶馆数量应该不会少，但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保存下来，《汉口竹枝词》第三十七首中说“无数茶坊列市阗”，除此之外并无其它的数字记载。有所记载的茶馆有

^①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一一三首，第 76 页

^②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一一四首，第 76 页

^③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一一五首，第 76 页

^④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丛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489 页

^⑤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一二三首，第 81 页



白蘋洲：位于大智坊，主人王姓，其志不在茶馆，仅为托身市隐之处，故白蘋洲规模较小，生意也比较清淡，不像一些酒茶馆或书茶馆有文艺表演，白蘋洲属于清茶馆，仅为喝茶说话之地，却又因其清静而得到一些文人墨客的亲睐。文人题诗写文于茶馆墙壁之上，中国文人自来有此癖好。道光年间的这间白蘋洲也不例外，清人程耕云（写有《豫成园记》）因喜其名雅，就题文于茶馆墙壁，文章不仅记述了茶馆主人的品味，茶馆的经营情况，同时还记述了在茶馆中饮茶的感受。来此喝茶的即有官场上逢迎拍马之徒，到此喝杯茶以消除内心的厌倦，又有暂且驻足的劳人，喝茶消渴，休息片刻。不管是富商大贾还是贩夫走卒，来到茶馆中都成为了饮茶中人，个中滋味，每个人都慢慢品尝。品茶在这里成为了品味人生。^①

小江园、楚江楼：对于小江园和楚江楼的记载很少，见到的只有叶调元诗句中的描述：“层台百尺俯清流，客到先争好座头。一幅烟波分两地，小江园对楚江楼。”^②在这首诗的附带说明中记载到：“两茶坊同巷对门，面临大江，足以游目。”^③由此可知，这两座茶楼都在长江边上，坐在茶楼上一面喝茶一面观赏长江水面的景色，是茶客们的喜好，所以顾客一上茶楼总要先占到好的位置。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未有记录在案的茶馆，以及一些设置简陋的露天茶馆。《汉口竹枝词》第四十一首写道：“坛场数亩排茶桌，顽雀人来坐一回。”^④在米场附近的茶馆设置简陋，只是摆设一些茶桌茶座，大概主要是供码头工人暂时歇息解渴。但却有许多玩鸟的人多在此聚会聊天，结果这里又成为玩鸟之人聚会的地方。

3. 早期汉口茶馆的特点

汉口受到商业影响最深，并有着自己的民风民俗，所以早期汉口的茶馆也有着自己的特点：

（1）早期汉口的茶馆已与地方戏曲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

自宋代茶馆在市民中间普及以来，茶馆的功能就不仅仅是解决人们生理上饥渴，它有着复杂的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茶馆成为了保存和传播发展民间戏曲文艺的场所，它的休闲娱乐功能和潜在的文化传播功能越来越明显。人们到茶馆来，不仅仅只是为了喝茶，同时还是一种休闲娱乐和享受。

清朝中期汉口镇的茶馆同样具有着这样的特点。《汉口丛谈》卷二中说：大智

^①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丛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189 页

^②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28 页

^③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28 页

^④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29 页



坊一带,经常会看到一些少妇,青衣布素的打扮,手中提着竹篮,好像是去做缝纫的,其实是善歌小调的“唱婆子”。所谓“黑漆包头白粉腮,竹筐携去店门开。等闲爱听清平调,十个金钱唱一回。”^①这些所谓的唱婆子都来自民间,为了谋生来到汉口,驻足在汉口的茶馆、酒楼等公共娱乐场所卖唱挣钱。她们与茶馆相依为生,茶馆靠这些民间艺人吸引顾客,而她们则把茶馆作为绝佳的演出场所。我们在道光年间的另一本小书中可以读到许多描写茶馆中文艺演出的诗句,“清茶寂寞殊无味,要听丝弦怕熟人。能使两难成两美,地方最好早逢春。”“沿湖茶肆夹花庄,终岁笙歌拟教坊。金凤阿香都妙绝,就中第一简姑娘。”“茶香烟雾袅灯光,为恋清歌不散场。四座无言丝肉脆,望湖泉外月如霜。”早逢春和望湖泉等茶馆中,都是民间艺人活跃的场所。

“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

^②在茶馆中演出的有地方小调如梁山调^③、道情^④,还有民间杂耍、木偶戏^⑤等。

(2) 女子到茶馆喝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教礼仪,女子是不能随便外出的,更不能不避生人,无所顾忌在公共场所露面。但是作为以商业贸易起家的汉口一镇的风俗,却有异于此。根据徐焕斗《汉口小志》的记述,女子好游是汉口镇及周围地区的一种民情风俗,“汉沔风俗,女子好游”,^⑥每每花朝月夕,士女喧阗,“汉有游女余风未殄,烧香也,看会也,龙船也,游湖也,看戏与赏花也,地方稍有盛举,逐队成群,出头露面,谈笑无忌……”^⑦根据现有的史料,至少在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汉口的女子打破了不能随便外出、不避生人的封建礼俗,她们不仅在风俗节日期间抛头露面,而且

^①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第 204 页

^②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一一九首 第 79 页

^③ 梁山调,今称良善调,根据《汉口竹枝词》的解释,梁山调是一种比较轻佻庸俗的小调,其来源说法有两种,一是周贻白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说:“据艺人们传说,是清代康熙末年(1722 年前后),河南省的月调传入钟祥,和当地的花鼓戏相结合,因而形成的一个剧种”;二是刘正维在其所写《梁山调腔系考究》中认为:梁山调起源于四川梁山县(今梁平县),由于农民起义,移民迁徙,经济交往,语系相近等原因,流传到湖北等地,多达三十多个县。参看《汉口竹枝词》第 80 页

^④ “道情”是白唐宋以来以道教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说唱艺术,明清之际发展成为一种以讲述道教故事为主的叙事体和道情剧,成为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全国很多省份都有不同风格的道情,湖北道情是在洪湖打硪号子、天沔花鼓戏唱腔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其唱腔曲牌有的是洪湖一带的打硪号改编而成,有的是由湖北鱼鼓曲牌衍化而来,其曲目也多数从其他曲种中移植。湖北道情还可细分为“随州道情”、“阳阳道情”、“公安道情”等。表演方式主要为一人站唱,也有两人以上演唱,以唱为主,间有说白。演出器具具有鱼鼓、竹筒、二胡、大三弦等。湖北道情形成时间较晚,这时的道情估计指的是地方道情进入汉口茶馆的演出。

^⑤ 范楷《汉口从谈》也有关于木偶戏在茶馆演出的记载,“周乔龄,同人后湖晚步,入市观灯云:‘湖川麦秀欲齐腰,湖肆茶香暖易交。傀儡登场争聒耳,春情多上柳眉梢。’”参见《汉口从谈校释》第 104 页

^⑥ 徐焕斗《汉口小志》,汉口后花楼懿铭印务局 1915 年版。转引自张仲礼、熊月之、沈祖棻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之第八章“沿江城市民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32 页

^⑦ 徐焕斗《汉口小志》之“风俗志”,汉口后花楼懿铭印务局 1915 年版。转引自张仲礼、熊月之、沈祖棻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之第八章“沿江城市民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32 页



出入茶馆，与男子坐在一起喝茶，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汉口茶馆中活动的女子主要分为三种：

一是妓女，清中期常芝仙诗句中有“红袖嬉茶社，青帘动酒人”^①之说，就说明了茶馆也是妓女活动的场所。

二是卖唱女子，如那些青衣布素、善歌小调的唱婆子，如望湖泉茶馆中的简姑，为了谋生而被迫到茶馆中卖唱。

三是普通的女茶客，“后湖时有妇女结伴闲步，倦即偈坐茶寮，呼烟唤茗，不以为嫌也。”^②黄心鑫的诗句中也有“粉黛亦参卢陆座，箏琶常闹楚秦歌。”^③《汉口竹枝词》第一三七首“大方全不避生人，茗碗烟筒笑语亲。几句寒暄通套语，舌尖透出十分春。”^④

究竟有多少女茶客，也有约略的记载，如新安吴浦舟的《竹枝词十首》中有“十数席中占一席，高抬纤足剥花生”^⑤，茶馆中的女茶客约占所有茶客的十分之一；

“望湖泉里听笙歌，半是衣冠半绮罗。歇着数乘空轿子，惹他门口聚人多。”^⑥望湖泉里女茶客的数量竟然和男茶客相等，这里虽然有着诗人过于夸张的语言，但至少证明了这时汉口茶馆中女茶客还是有一定数量并成为普遍现象的。

究其原因，女子节日出游、结伴喝茶不避嫌，应该在于汉口作为一个商业城镇，而且发展历史较短，所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束缚较少，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对女子的束缚在这里影响有限。另外还和汉口的环境有关，汉口夏天烈日炎炎，温度极高，人们为了消暑，往往穿着极少，有些人还常常通宵达旦睡在外面，如《汉口小志·风俗志》中就有记载：“夏间热度颇烈，轻罗薄纱，愈轻愈好，下等劳动家有终日赤体者亦有通宵露宿于外者，男女多爱吃茶，以故茶楼日渐发达。”^⑦喝茶又有消暑的功能，所以女子到茶馆喝茶也成为一种需要。

^①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涛译：《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84页

^②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涛译：《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208页

^③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涛译：《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80页

^④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91页

^⑤ 范楷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涛译：《汉口从谈校释》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第208页

^⑥ 叶调元著 徐明庭、马吕松校注：《汉口竹枝词》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102页

^⑦ 徐焕斗：《汉口小志》 第73页 中国地方志集成



第二节，近代汉口的茶馆

1. 近代汉口发展概况

1861年汉口开埠，是汉口乃至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向国际性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紧接着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家也先后来汉通商。很多外国商人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或其它工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①据统计，在张之洞督鄂之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共有11家，这些原料加工厂的开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外国商人又在汉口创立了许多“洋行”，这些洋行经营航运、货物信托、水火保险等业务。“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洋行的设立，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型的国际性城市迈进。”^②

1889年—1907年，张之洞督鄂，是促使汉口继续发展的又一大推动力，张之洞督鄂期间，汉口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从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民族工业得到起步，武汉三镇的近代教育体制得到完备。汉口的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苏云峰说：“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③立足于汉口的发展，这句话是成立的。

从近代汉口人口的增长情况，我们也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汉口的繁荣与发展情况。1840年以前，武汉总体大约30万人；由于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对武汉的破坏，到1853年（咸丰十年）武汉三镇人口减少约20万人，汉口一镇占10万；开埠以后，人口急剧上升，到1888年（光绪十四年），汉口共26685户，180980人，汉口市区人口达到了18万人；1908年，根据清政府对人口的普查结果，江夏县（城镇与农村）594420人，夏口厅244892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703.7人；1911年，根据《湖北武昌等十一属六十八州县城议事会议员姓名履历（清册）》（1911）记载的人口数，夏口厅为59万人。整个武汉城镇在开埠后半个世纪内，增长了将

^①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史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转引自陈锋《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载《江汉论坛》2002年11期

^② 陈锋：《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载《江汉论坛》2002.11

^③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



近三倍。^①根据《申报》所载,清末武汉三镇“人烟辐辏,烟火百万家”。菲尔德维克就推断武汉三镇共有人口115万,其中汉口80万,武昌25万,汉阳10万。另据《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所载:“汉口市埠濒汉水长江北岸,西自硚口,东至洋火厂,为一长方形,商埠长约五六十里,全埠人口八十万。”^②罗威廉认为汉口的人口数量为“1800年为100万左右,19世纪中期为150万,1890前后又为100万上下”。^③由于武汉三镇建制的变迁,对于汉口镇人口数量的统计都较为零散,不过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汉口镇在19世纪中后期人口数量在直线增长,到了清末,人口数量达到了100万以上,完全可以视为一个大型城市了。

20世纪上半叶,汉口镇不断遭受各种天灾人祸的破坏,1911年武昌起义,汉口江岸地区、江汉地区炮火毁坏殆尽;1931年5、6、7月的长江大水,三镇一度水深一米多,总计被淹16万多户,受害人口70多万,死亡3000多人;1938年5月,武汉保卫战,抵抗4个多月,之后汉口沦陷,在日寇占领下城市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到1950年,整个武汉三镇城市人口只恢复到1042924人,比1936年少20多万。^④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1915年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五四运动这些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政治和文化变革,同样影响着汉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1911年的辛亥革命创造了一个形式上的共和国,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深入人心,至少在社会中这些口号成为一种公共议论的话题经常出现于大众传播媒体之上。近代媒体如报纸、杂志等出现,汉口在1873年就已经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艾小梅的《昭文新报》,到了清末,武汉已经有130报刊;五四运动后,受新思想传播的影响,1919—1923年就创办报纸135种。这些报刊杂志一方面传播了新式民主自由人权等思想,打破了封建思想对人们的禁锢,使社会风俗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向现代文明转变,另一方面又与大众娱乐相结合,通过刊载娱乐广告、推动大众娱乐业的发展和自身的发展。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汉口社会的大众娱乐的普及性语境。

汉口的茶馆业、茶馆文化、汉口茶馆的特点等,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发生着不同的变化。

^①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人口发展轨迹》,江汉论坛 1995.4

^②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棻:《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之第七章“沿江城市的人口发展”,第3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 [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53页

^④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棻:《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2, 近代汉口茶馆的发展概况

从清末道光年间以来,汉口后湖地区的茶馆业就非常发达,大大小小的茶馆成为仕女闲人休闲娱乐的最好去处。清末民国时期茶馆业进入繁盛发展时期。

数量

汉口茶馆的数量在清末及民国初年达到最高峰,如1929年国民党汉口市党部所作的《关于茶馆的调查》指出:“茶馆是市民聚会最方便而适当的地方,所以茶馆成为本市最发达而最多的营业……”^①根据皮明麻的记载,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汉三镇的茶馆一共有411家,其中汉口250家,武昌133家,汉阳28家;到1918年,仅汉口就增至696家,1928年,增加到1117家,1933年达到1373家,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武汉茶馆业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武汉的沦陷使武汉城市发展受到了极大破坏,茶馆业也从此一蹶不振,到解放前夕,武汉三镇的茶馆剩下300多家。

②

分布

汉口茶馆,以繁华的汉正街一带分布最多。汉正街的茶馆又主要开设在北侧热闹的地段,旧时的新安市场附近及观音阁附近,茶馆、茶楼比比皆是,如在观音阁后面的鸣皋大型茶馆在汉正街就比较有名。仅处汉正街中段的大火路一带就有汉口、龙泉、合兴、联兴、清香、洪发、万利、春来、汉泉等17家大小茶馆,被人们称为“干不死的大火路”。^③

规模

近代汉口的茶馆,按照其经营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大型的茶馆:房屋较为宽敞,环境优雅,设施完备,不仅有供普通喝茶人的茶座,还专门设有雅座,备有躺椅,不过茶资也会高出3—5分,有些茶馆还附带有小型酒馆,兼营各种早中晚餐饭和香烟、瓜子等零食。这些茶馆大多设在闹市区,茶客大多是接洽生意的商人。如位于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同善里(积庆里)口的临城茶楼,在20年代之前曾是一座两层楼的茶馆,有茶桌七八十张,每天的茶客有一千多人次,因为处于闹市中心,环境优雅,生意特别红火;位于中山大道民意一路口的江南春茶楼,有三层楼,茶桌七八十张,由三十年代武汉洪帮头目朱协卿所开,也是出名的大型茶馆。

^① 袁素娣:《茶馆撷趣》武汉文史资料 1994年第2期

^② 皮明麻、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188页

^③ 王默:《漫谈汉正街茶馆》武汉文史资料 2006年第11期



中等规模的茶馆：一般会有 5—8 人的茶房，白天卖茶，晚上有各种各样的曲艺节目如评书、楚剧、汉剧、皮影戏等。位于硚口路的德心茶楼，位于大夹街的凤台茶楼，汉正街的安乐泉、长堤街保寿巷口的保寿泉茶馆，利济南路口的清香茶馆等，都属于规模适中的茶馆。

小型的茶馆：一般只有一两间房子，如新安市场药帮巷口的杨鹤茶社。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时候，汉口曾出现了一些居于茶馆与戏院中间的娱乐场所——茶园。1899 年，大智门外如寿里出现了汉口第一个茶园——丹桂茶园，演出京剧。从 1899-1911 年 12 年间，汉口共开设有丹桂茶园、天一茶园、满春茶园等 15 家。^①这是随着近代城市娱乐文化的发展，公共娱乐空间的一种变化，与后来的戏院相比，不同的是这些观众是一边喝茶一边看戏；与以前的茶馆相比，这些茶园的规模更大，例如位于满春路三无殿后的满春茶园，可以容纳 2000 多观众。汉剧、楚剧、京剧等都在这里演出，很多著名的演员也常常出现在这里，如汪笑侬、余洪元等京汉名角就曾在天一茶园同台演出。

1911 年前后，茶园和称为舞台的剧场交叉出现，1920 年前后，戏院渐渐从茶园中走了出来，直接出现了“大戏院”或“大舞台”，这种类型的茶园也就渐渐消失了。

按照茶馆雇用员工的数量及资本资金来看，汉口的茶馆一般多使用 1-3 名员工，资金多为 100、200、300 元等的小茶馆。根据 1937 年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的统计，当时登记在册的茶馆共有 494 个，其中雇用工人在 5 人以上，资本资金在 800 元以上的茶馆有 25 家。

雇佣员工数	茶馆名	业主	资本资金（元）
九人	汉南春	朱协卿	2000
	怡心	冯洪甫	2000
八人	中信	余友谦	1500
	凤台	左启华	1500
	清泉	何永康	2000
	洞天居	李禹卿	1500
	四云	邬锦云	2000
七人	歆生阁	屠玉山	800
	临城	林良栋	1000

^① 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文化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90-191 页



	话雅	雷志卿	1500
	第一楼	江秀山	1500
	世界第一	郑世新	1500
六人	高陞	田礼堂	1000
五人	春山	韩春山	800
	得月	闵福山	800
	樊川	万春山	1000
	三镇	王春山	1000
	仁和	缪继正	800
	品香	丁开文	800
	龄鹤	罗谷侠	800
	德心	周德元	800
	洞口春	胡春山	1000
	一洞天	李明庆	1500
	汉泉	姚兴汉	800
	武汉第一	夏春山	1000

资料来源：湖北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 武汉档案馆



第二章 汉口茶馆文化

按照日本学者铃木智夫对清末江浙一带茶馆的考察，他认为茶馆“是人们生活中集社交、集会、交易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重要公共场所。为维持自身的生存，茶馆的经营方式呈现多样化，包括以说书、唱曲等艺术形式招揽顾客，更有开设赌场烟馆等获利形式。茶馆还是民间进行公平审判的重要场所。在革命之际，茶馆又成为各种消息的传播中心。”^①同样的，近代汉口的茶馆在历史变迁与城市生活中，也具有着这样的功能，成为近代城市生活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半公共空间。

从 1861 年汉口开埠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近百年的岁月，汉口城市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变迁：张之洞治鄂的短暂繁荣、辛亥革命的战火破坏与重建、沦陷区日本铁蹄的蹂躏，不可预测的水灾火灾。这里有各地商人、有政客、有帮会、有警察、有普通市民、有码头工人、有妓女、有江湖艺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人往往都愿意选择茶馆作为他们进行交易、宣传思想、秘密政治、搜集信息、休闲娱乐、挡风避雨的地方。所以，近代汉口的茶馆在历史发展中，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层次、种类，为满足不同的人群需要；各种不同人群的自然选择，也形成了不同茶馆之间的特点与文化。

这里的茶馆，有些是青洪帮大哥所开的“公口”茶馆，是秘密会党联络之地；一些茶馆，自然成为各种商人交易场所，不同行业的商帮又往往会固定选择一个或几个茶馆；一些茶馆因为靠近码头，因此成为码头工人工作间隙休息的地方，另一些茶馆因为靠近闹市，曲艺节目种类繁多，市民工作一天之后，往往选择这些茶馆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各种曲艺节目以消除一天的疲惫。这些都形成了汉口茶馆丰富的内涵，它并非是一个死去的老房子，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汉口人的生活和历史。

生活在不同城市阶层中的汉口人，对汉口的茶馆有着他们固执的爱好；或许一位码头工人，做了一天的苦力，挣到的是微薄的工资，除去生活开销之后已经所剩无几。夜幕降临，繁星满天，热风吹拂，匆匆吃过晚饭后，他急忙赶到最近的一家简陋的茶馆，这里茶资便宜，而且晚间会有说书、小曲。虽然设施简陋，但看着是那样亲切，不一会小小的茶馆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客，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底层

^① [1] 铃木智夫：《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载《中国近代史》2002 年第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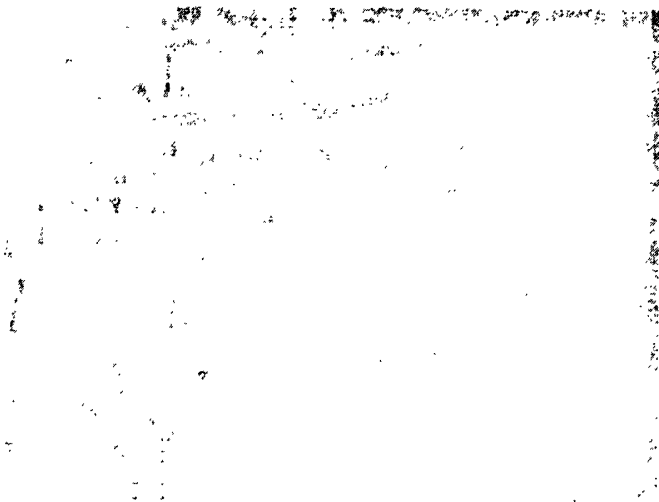
人，穿着粗布衣服，品着廉价的茶水，全神贯注盯着前面台上的演出，可能是说书，也可能是江湖艺人的小曲演唱，或是杂耍、皮影戏，精彩的演出不时会引起满堂的喝彩。

于此同时，在汉口的另外一些茶馆中却可能上演着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这里空间开阔、设施豪华，或有包间、上好的檀木桌椅，来这里喝茶的人出手阔绰、一掷千金。来这里喝茶，不仅仅是喝茶，讲的还是排场，京剧、汉剧、楚剧名角轮番上场。也许在某一个茶馆不为人注意的角落，一个秘密的政治计划正在筹备，或茶馆的阴暗处几双诡秘的眼睛正密切注视着茶馆中人的举动，以便得到有效的情报。

对近代汉口茶馆文化的研究，我们将发现一个独特而又奇异的近代城市文化与生活空间。

第一节，汉口市民的生活空间

清末民国时期的茶馆作为一种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都市市民聚会场所，具有着一种“公共性”，和西方的咖啡馆、沙龙相比，中国的茶馆首先是城市居民聚集起来休闲娱乐的场所，喝茶会友、聊天吹牛、身体的休息、赌博玩乐、听曲



清末民初，汉正街一带的茶馆旧貌

斗雀，是其中的必然之义。“一般的市民，每天做完了事，差不多都要到茶馆休息、谈话、乘凉，因为茶馆是市民聚会最方便而最适宜的地方。”^①

汉口茶馆里一般都有普通座和雅座之分。普通席设条凳，泡下等茶叶，雅座区

^① 《文艺志资料选辑》一（内部资料），转引自华中师范大学 傅才武博士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 1861—1949》第 107 页



设有靠椅、躺椅、沏上等茶，一些高级的茶馆到了冬天椅子上还铺设狗皮毯子供茶客取暖。夏天汉口天气炎热，很多茶馆就将茶桌摆到屋外或搭设凉棚，供客人一边喝茶聊天一边乘凉避暑。如洞口春茶楼窗外到了夏天就摆设三排靠椅。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茶馆，如在新市场（今民众乐园）、长江饭店、中南旅社等屋顶之上开设的所谓屋顶花园茶社，既别有一番风味，夏日又可以纳凉消暑。

来往茶馆中的人物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说明江湖人物的故事往往发生在茶馆中。一个穷途末路的人准备摆个摊给人算命挣点生活费，但是行有行规，刚刚摆上算命摊就遇到了麻烦，被几个人带到了附近的一个茶馆。茶馆里坐着两位老江湖算命先生，一个是彭九皋、一个是梁飞鹏。按照规矩，他要先拜这两位老先生为师，行完磕头礼、交纳入行费，方可从事算命的行当。^①

1. 日常生活聊天休息

到了清末民国时期，茶馆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汉口城市市民生活的一种方式。

汉口茶馆的茶叶一般都选用“毛尖”茶，主要是因为“毛尖”茶价格适中，适合大众消费，茶味清香，多泡几次仍然茶味浓郁。据了解，毛尖茶叶用马铁制小盒装，每斤茶叶可以分装 104—110 盒，每盒可泡一壶茶。茶具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不同，20 年代以前一般使用盖碗茶碗，这种茶碗比较讲究，大多是江西细瓷，上有杯盖，下有碗座（茶船）。30 年代之后除招待少数上层人士仍沿用盖碗外，一般都逐渐改成了茶壶泡茶，另放置一两个小瓷杯或玻璃杯，由茶客自斟自饮。之后，一些茶馆也开始使用茶杯泡茶。茶资在 20 年代初，社会上使用的是窟窿钱（铜钱），一般约 8 文钱，后来涨到 12 文。二十年代改用铜板后为 4—8 枚钱不等，30 年代开始使用镍币之后，每壶茶约为 4—8 分钱。^②

茶客来到茶馆，坐上席位，茶房就会自动上来把茶碗送上，茶资先付后付均可，茶房都会有记号。比如在用盖碗泡茶时，如果茶客是先付茶资后喝茶，茶房上茶时就随手把茶碗座子收走，未付则不收。后来改用茶壶盛茶时，先付钱用的是兰细口茶杯，未付钱的则用光口杯，以此进行区别。

王笛对成都茶馆的考察中发现，很多人是在茶馆中从早坐到晚的，很多人家里都不做饭，在茶馆中吃饭、喝茶、休息。汉口作为近代与成都相比更为开放的城市，

^① 郭瑞廷：《回忆旧社会的相命骗术》，武汉文史资料第 29 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

^② 田梅村：《旧时代武汉茶馆见闻》，武汉文史资料第 18 辑，同上



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些汉口人专门选择兼营澡堂的茶馆，特别是在冬天下雪的时候，上午喝茶，下午“泡澡”，这样的一天，既过足了茶瘾，又驱寒取暖，即所谓的“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好不快活。

有些单身汉，一起床就上茶馆洗脸漱口，泡茶喝茶。这时候那些提着篮子卖早点的小孩子已经将各种油条、饼子放在茶桌上任凭茶客取食，吃多少算多少，剩下的再由提篮子的收去。还有一些茶馆的隔壁或者茶馆内部就专门开设了早点摊，例如开在临城茶馆斜对门的洞口春茶馆，楼下是老福庆和米粉馆，其上楼处的旁边是卖生煎包子的小摊，喝茶、吃早点就联系到了一起。其他的还有如洞天居茶楼，开在江汉路上，它的上楼处也有一个做生煎包子的。

开设在汉正街集家嘴汉水边的怡心茶楼，是一幢有三层楼房的大茶楼，设备齐全，设有茶桌六七十张，茶客多半是汉水来往的船民和乘客。他们在停船靠岸之后，往往来到这个茶楼休息。这里除了卖茶之外，还不定期经营各种面点和炒菜供茶客吃午饭。

球场街的汉泉茶楼，面对的多是人力车工人、手工作坊雇员等劳动人民。他们下班后，往往来到该茶楼洗脸、喝茶、或躺到竹椅上休息片刻。上班时间一到再去干活。

茶馆所处的位置不同，也使茶馆要面对不同的客流群；如开在保成路里口的荟萃茶馆，茶客大半是江浙帮做红木家具、包做房屋的工人；开设在三民路的沧海茶馆，面对的是来往的客商行旅；陈玉记开设在长堤街保寿巷口的保寿泉茶馆，是附近小手工艺作坊、牙刷厂、彩染坊、木作坊、铜铁业小手工业者下班之后经常光顾的地方。

茶客们来到茶馆之后，除了喝茶休息之外，多是谈天说地，海阔天空。除了那些来到茶馆临时休息的人之外，也有在茶馆从早泡到晚的闲人。不过茶馆中的人们在聊天时都不敢过于大声，因为茶馆的墙面上大都用红纸贴着这样的警示语：“各照衣帽，小心钱包”和“闲谈莫论国事”。如果不听业主的劝告，小则丢物损财，大则吃官司进班房。^①

在茶馆中有所谓一日“三茶”的规矩，即早茶、中茶和晚茶。早茶从早上开门到午饭时分；下午6点钟到晚上10多钟关门是晚茶时间；下午为中茶时间。过了早茶的时间，茶客就要“换茶”，付中茶的钱。过了中茶时间，就要付晚茶的钱。

^②很多人在茶馆中一呆就是一天，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暂时出去，而且和“茶博士”

^① 王远翔：《从歇后语说到汉口的茶馆》，《武汉文史资料》1996年第3期

^② 《汉口的茶馆》，王登福主编《江汉史话》，武汉出版社，2003年



比较熟的话，可以把茶杯“弯倒”（不动的意思），意思是叫“茶博士”不要收了茶杯，本人还要再来喝，而且还要把茶杯盖翻转过来，使盖里朝上盖在茶杯上，否则，再来时又得重泡一杯。当然，如果是生客，“弯茶杯”是不可能的。^①

武汉是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夏日炎热的天气迫使很多人不愿呆在家中。所以一到夏天，汉口还会出现很多搭着凉棚的露天茶馆。每当夜幕降临，茶客都会来到露天茶馆，品茶纳凉，弹琴说唱，热闹非凡。如老圃、维多利亚、新生等花园，甲子、大陆、中南、汉瀛、长江等旅行社的楼顶平台上都会搭建露天茶苑。这类茶馆，只售盏茶（一客一杯），种类有红茶、绿茶、花茶等。茶客来到后自报茶名，茶资比较贵，一般为其它茶馆的一倍。一些公子哥、或腐朽的商家老板来到这里寻欢作乐，所以这些茶馆还可叫定票（完过花税的妓女），来陪伴喝茶或唱曲儿，一些上层妓女的局票有时可以达到两块银元以上。

2, 斗蟋蟀、玩鸟、下棋

清末民初至解放前夕，武汉有斗蟋蟀的习俗。汉口的涵万茶楼（现在的江汉区双龙街附近）和开设在后花楼街的“楼外楼”茶楼以及武昌的七巧茶社都是著名的斗蟋蟀的场所。

斗蟋蟀是中国传统的一种赌博方式，相传始于唐太宗贞观初年。每年秋季的时候，武昌、汉阳、汉口各地爱玩蟋蟀的人就会聚集于各种茶楼酒肆，互斗蟋蟀，赌资一般不大。斗蟋蟀赌博并不仅限于武汉各地，较大的赌博一般发生在汉口本地与仙桃镇等外地客帮之间。茶楼上一般设有两到三个站台，专供斗蟋蟀时使用。

斗蟋蟀时要求并对子，就是双方的蟋蟀大小要相等，如果想以小斗大，则必须双方同意。开斗时，将蟋蟀放入斗场上的斗盆（即香炉）内，两人负责掌掸子，将两虫赶拢，待两虫接近后便不再掸，而由两虫互咬。一个作评判，赌资多少，由双方事前议定。双方各站3人，以作鉴证，台的正面不许站人，以免呼吸影响蟋蟀的斗志。每一局除虫主参加赌博外，台下观众也可以某虫下注。一般说来，每斗一场，输赢大概在一百串到五百串铜钱之间，有时也会高达一千串以上。所以说，斗蟋蟀从一开始就和赌博有着密切的联系。斗蟋蟀期间，茶馆生意就会格外红火，提着蟋蟀前来相斗的人，在旁边观战的茶客，往往挤满了站台。所以茶馆茶楼也乐于提供场所。

宣统年间（1909—1911）湖南长沙帮与汉口本地帮之间的一场大战相当有名。

^① 龙从启：《也谈武汉的茶馆》 载《武汉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1985年第1期



湖南长沙帮携带了十几只蟋蟀来到汉口参加涵万茶楼的赌局，其中有一只叫做“辰州符”的蟋蟀参加了大大小小十几场战役，斗败了所有本帮外帮善斗的蟋蟀，威风凛凛无人能敌。不料汉口帮的玩蟋蟀高手范阳生训练出了一只“虾青白麻”，也非常厉害，他看到辰州符连斗数十场，已成强弩之末，便拿出养精蓄锐的虾青白麻叫战。湖南长沙帮见范的虫躯干壮硕，便有些怯场，范阳生为了激将他们，就在虫盆上插上“专打辰州符”的标签，连连挑战。武汉玩场的人也竭力怂恿他们交锋。最后武昌人孙胡子答应伙赌一个元宝（50两）。开斗那天，好事者将涵万茶楼挤的水泄不通，并纷纷下大注押在虾青白麻身上。当两虫入斗盆时，虾青白麻一口就咬掉了辰州符的半个门牙，后者体力不支，晕倒盆内。几分钟后，双方再斗，辰州符的门牙又被咬掉半个，再次晕倒过去。当掌揸人去碰它时，发现已命归黄泉了。虾青白麻高声欢叫，庆贺得胜，全场也为之沸腾。那只装虾青白麻的盆子后来就被刻上“专打辰州符”五个字以资纪念。

当时这两只蟋蟀在涵万茶楼的战役在玩蟋蟀人之间是一个不小的战事，吸引了很多人围观。1928年范阳生的“车铃”在楼外楼战胜仙桃镇首富傅八的“响铃翅”的战役也为时人所津津乐道。^①

玩雀子、下棋也是汉口市民在茶馆中的一种娱乐方式。开设在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的临城茶楼，是雀子商人和玩鸟爱好者的聚集之地。临城茶楼居于闹市中心，是一栋两层楼房的大茶馆，楼上楼下有七八十张茶桌，每天来往的客人不下千余人次。那些雀子商人和玩鸟爱好者聚集这里，一边喝茶一边评鸟，并洽谈买卖交易。常见的鸟雀有鹦鹉、百灵、黄燕、八哥、画眉等。不过一般来这里的都是一些富商巨贾、达官显贵等，因为据说一只百灵的价格可以达到十块银元以上，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承受得了的。

在茶馆里下棋，同样是许多汉口人的生活方式。如安全茶楼、惠然来茶楼、汉乐春茶馆和洞天居茶楼都是有名的下棋场所。“洞天居”茶楼坐落在繁华的江汉路上，有上下两层楼，楼下主要是卖熟食、早点，楼上则摆有几十张大圆桌，还有几个包间，最多时可坐几百人。下棋主要就是在楼上进行。如果遇到有名手比赛、表演的时候，包间就成了对局室，外面是观战室，著名棋手杜晓天来到武汉后，还发明了一种大棋盘，挂在外面，以便于大家观战。茶馆不仅是本地棋手的活动场所，还有着对外地棋手迎来送往的任务。“洞天居”常常举办一些“埠际友谊赛”，让本地、外地的棋手同台献技。逢有这种赛事，茶水往往会涨价，茶楼老板也非常乐

^① 刘文保：《旧时玩蟋蟀的见闻》，武汉文史资料，1987年第三辑，总第29辑



意提供场地。^①

另一个著名的有“华中棋王”之称的罗天杨^②先生，曾长年累月在江汉乐茶楼下棋，这里设有普座和雅座，聚集在这里的茶客一般都是棋迷，很多象棋高手常常出没在这里。旧时汉口茶馆中的棋局往往附带赌博，棋手也是靠此为生，而且一些著名棋手比赛时，还要给一定的出场费。解放初期，市公安局开始禁止这种茶馆下棋的形式。

3. 聚众赌博

民国时期武汉的茶馆，有“清水”和“浑水”两种，“清水茶馆”以卖茶为主，茶馆里不打牌不唱戏；“浑水茶馆”既卖茶，又有唱戏、卖曲、打牌、赌博等其它的娱乐活动。虽然武汉一直有着一些半明半暗的大赌场，但是由于茶馆场所方便，既集既散，也成为人们聚众赌博的好地方，而茶馆为了招揽生意、维持生存，也往往愿意为这些赌博活动提供便利的条件。很多茶馆都会在晚上十点之后进行赌博活动，如汉天春茶楼、一洞天茶馆，汉南春茶馆的老板朱协卿就是以赌博为生，武汉第一楼茶馆的老板姜秀山则是汉口著名的赌棍，很多人深受其害。

作为旧时茶馆的一种痼疾，聚众赌博是茶馆吸引茶客的一种手段，当然也成为汉口市民一种不甚文明的生活内容。开设在新安市场药帮巷口的杨鹤茶社，茶桌不到十张，主要收入靠抹牌抽头。在日伪时期，附近药材号、行的老板，雇员及日伪工作人员，常在此赌博，往往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又如陈“将爷”在后花楼街和成菜场开设的德意茶馆，茶客多是稽查处、禁烟督察处，派出去的水客（爪牙），常来常往的地方，他们在这里碰头、听汇报、入夜赌博。开设在方正里的苗景茶馆，是警察局刑警队派出去的水客在这里搜集情报、听取汇报之地，每晚必赌。其它的如袁玉山在三民路开设的德华茶馆，江汉路上的洞天居茶馆，永安市场街面楼上的汉天春茶楼，味春茶楼、保春茶楼，都是有名的聚赌场所。

4. 茶房的生活

茶馆工人被人们称为“茶房”、“跑堂”或“茶博士”。王笛通过对成都茶馆

^① 钱刚：《李义庭——从神童到巨匠》，载《棋艺（象棋版）》1998年第6期

^② 1887-1964，中国象棋名手，有“华中棋王”之美称。湖北红安人，原为白铁工匠。自小喜欢下棋，30年代一度在武昌黄油楼公开应众对阵。遍游华东、华南各地，与各地名家比艺。1930年曾在上海与七省棋王周德裕做过多次对局，更是名声大振。在武汉，人们一般叫他“洋铁”或“罗洋铁”。建国后为湖北省文史馆员。



的考察,认为“茶房”是茶馆的“灵魂”。他们不仅招呼客人要热情、掺水要及时、清理桌子茶具要干净快捷、找钱要准确,而且还要眼观八方、思维敏捷,遇见不同的茶客要不同的对待。王笛在文章中还津津乐道地写了茶房最为人称道的掺茶技术。“堂倌一手提紫铜茶壶,另一手托一叠茶具,技术高超者可多达20余套。未及靠近桌子,他便把茶船茶碗撒到桌面,茶碗不偏不倚飞进茶船,而且刚好一人面前一副。顾客要求的不同种类的茶也分毫不差。只见他距数尺之外一提茶壶,开水像银蛇飞入茶碗,无一滴溅到桌面。然后他向前一步,用小指把茶盖一一勾入茶碗。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令外乡人瞠目结舌,如看一场魔术表演。”^①

这种带有着传奇色彩的描写写出了茶房光鲜的一面。真实的情形却是旧社会中饱受剥削的悲惨生活。汉口茶客中曾有这样的谚语:“前世打爷骂娘,今生落得跑堂,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八只脚的床。”^②说的就是汉口茶馆中茶房的生活,他们工作时间长,待遇微薄,伙食差,晚上睡觉都没有固定的床,只能将两张茶桌并拢起来睡。这种艰苦的生活,茶客们把原因归结为是上辈子造了孽,打爷骂娘,不孝顺的后果。带着汉口人淳朴的责怪与同情。

第二节, 茶馆中的世俗文化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近代社会,茶馆与曲艺总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茶馆需要通过艺人的表演来吸引茶客、招揽生意,而江湖艺人需要把茶馆作为演出的便利场地以谋生存,这种相依相偎的利益关系使艺术与茶馆紧密相连。“茶馆与艺人的结合,在茶馆特多的江浙地区表现尤为显著。在苏州、乾隆年间开始,评书、弹词已广为人们所喜爱。……从清末到民国初年,评弹、杂艺、杂戏的上演,成为江浙地区茶馆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③

清末,一些地方曲艺形式开始随着汉口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进入到城市中来,如皮影戏、道情渔鼓,湖北小曲,评书,相声等。这些曲艺项目多在武汉的茶馆中演出,一方面茶馆以此来招揽生意,另一方面也成为武汉市民晚间休闲娱乐的项目之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时期,武汉曾遭兵燹,汉口大火使汉口损失严重。各路商贾为了避免军阀混战之苦,纷纷

^① 王笛:《茶馆、茶房与茶客——一个近代中国内陆城市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微观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页

^② 袁素娣:《茶馆轶趣》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2期

^③ [1] 铃木智大:《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载《中国近代史》2002年第6期



涌入汉口租界地带，形成了一时的畸形繁荣。据《汉口县志》记载，汉口一带五方杂处，不习耕种，多以贸易为业。不仅有本省商贾，各省商人也无不在汉口设有本店或支店及行帮、会馆。商业繁荣促进了茶馆以及市井文艺的发展。茶馆数量急剧增加，曲艺活动也呈现出一种空前的活跃之势。评书、善书、鼓书、以及各种民间戏曲都相对繁荣。

茶馆中的各种文艺演出对普通民众有着很大影响，有人称茶馆为“平民学校”，一些例子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姓刘的在茶馆中提篮子卖烧腊的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却知道乾隆是雍正的儿子而不是光绪的老子；还有一位姓喻的“街坊”，学徒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却能把《火烧红莲寺》讲的栩栩如生，就是因为他常去泡茶馆听书。

洋务公所“包打听”李华山在大智路上开设的一洞天茶馆，楼上为雅座，其他为普座。茶客大多是附近的小摊贩、人力车工人、手工作坊雇员等。一到晚上七点到十点，就开始唱皮影子戏，说评书等，评书一般是讲一些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传》等；或者是有女演员演唱“湖北小曲”“武汉小调”。戏曲演员，由二至四人组成，围桌而坐，乐器有二胡、扬琴、三弦、拍板、碰铃等敲击节奏。唱者，手舞足蹈、绘声绘色、有哭有笑、眉飞色舞。听者，聚精会神、津津有味，茶客边喝茶，边欣赏，悠悠然。同时，还兼营香烟、瓜子、花生、糖果之类，茶客进入茶馆品茗、候客等人，足不出户就可买到所需的各种小食品。

开设于中山大道利济南路口的清香茶社（后改为利济剧场），白天卖茶、晚上唱楚剧、汉剧或打皮影子戏。书茶价为每盏一角五分，茶社与艺人四六分账；星期日早场不售茶，只售一角门票，茶社与艺人五五分账。据说，老艺人朱瑞卿经常在此登台献艺，深受茶客欢迎。

其它的还有

德华茶楼：开设于汉口市三民路和清芬路交叉口。民国十九年（1930）始建，三层砖混结构。原为汉阳洪帮大哥袁玉山（绰号母狗子）经营的茶社。1950年改为曲艺茶楼。经营方式就是“借艺售茶”，茶楼与艺人四、六分账。因为处于闹市，所以这里的艺人多为响牌。其中又以说书艺人收入最好，一般要比同时期其它艺人高二、三倍以上。如说书艺人沈邦寿就常在这里说书。1966年文革时关闭。

万安巷茶楼：在万安巷茶楼曾有关于说书艺人童雪松一段有趣的轶事。评书艺人童雪松有一个徒弟，在这里说《水浒》。有一次感觉身体不适，让他的师傅童雪松来代说几天。童问说到哪了？徒弟说：外面大雪纷飞，武松从外归来，潘金莲掀



起门帘迎武松。四天后，他的徒弟身体好了，准备回去，就问童讲到哪了？童说：武松归来，潘金莲欲掀起门帘迎武松。

原来，童雪松从潘金莲掀的这个门帘的质地、花色、产地讲起，整整讲了四天，却始终都没有掀起来。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了当时评书艺人广杂的知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说书艺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春仙茶园：处于法租界。20年代，陶古鹏曾在此茶园演出楚剧。春仙茶楼可以容纳观众500人，与升平楼、天声、玉堂春等茶楼相比，属于最小。但由于有以小生挂头牌的陶古鹏在这里演出，所以每到华灯初上，不及300米范围的街区便车水马龙、人声鼎沸。^①

在近代汉口茶馆中经常出现的曲艺形式多样，包括民间流传的湖北小曲、花鼓戏、京剧、汉剧、评书、善书、大鼓、皮影戏、木人戏等。

1, 湖北小曲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京汉铁路建成，铁路与后城马路（今汉口中山大道）之间，护城河淤塞填平，后湖逐渐干涸，后湖地区也逐渐由盛转衰。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曲艺形式——丝弦小曲在汉口滩等地兴起。据老艺人朱寿高追述：光绪年间的汉口听众称之为汉滩小曲，也叫汉滩丝弦。建国后更名为湖北小曲。

湖北小曲源于明清俗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和融入部分当地戏曲声腔和民间小调，以唱为主，说唱相间。约在咸丰、光绪年间传入武汉。并出现了诸如“五音联弹”、“清音社”等专业班社，这些班社除出席丧、喜堂会之外，一般都是在茶馆演唱。演唱的曲目有《祭塔》、《天官赐福》、《大堂上寿》等等。汉口的票友以做粮食生意的食帮为主。

宣统年间（1909-1911），这种演唱小曲之风极盛，每到傍晚，三人一班，两人一组，有时常常几个班联合，在茶馆酒肆，大街小巷伴以丝弦而歌。

抗日战争结束后，湖北小曲走向衰落。建国后走向新生。

2, 花鼓戏（楚剧）

楚剧是从黄陂、孝感、黄冈一带的花鼓戏发展起来的，原名黄孝花鼓（俗称西路花鼓）。1839年（清道光19年）前后，汉口就有黄孝花鼓戏演出。最初演出地

^① 许恺景：《陶古鹏与楚剧》载《武汉文史资料》2005第5期。陶古鹏是楚剧著名演员，曾对花鼓戏音乐伴奏的设计改革有一定贡献，1967年逝世。



点是土垱（即今长堤街，统一街的下段）。当时，土垱虽属汉口的偏僻地段，但是商贾云集，舟车辐辏，特别是黄孝船只在此停泊、黄孝帮人在此聚集。因此土垱一带的茶馆较多，其中早逢春、望湖泉较为著名。黄孝花鼓戏也十分活跃，大都以茶馆为活动舞台。清代诗人、浙江余姚叶调元于己亥年重游汉口，写了一部《汉口竹枝词》，其中就有关于茶馆演唱花鼓戏的生动纪录。如：

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

土垱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

清茶寂寞殊无味，要听丝弦怕熟人。

能使两难成两美，地方最好早逢春。

沿湖茶肆夹花庄，终岁笙歌拟教坊。

金凤阿香都妙绝，就中第一简姑娘。

茶香烟雾袅灯光，为悉清歌不散场。

四座无言肉丝脆，望湖泉外月如霜。

这四首竹枝词一方面描述了土垱一带花鼓戏在茶馆中演出的盛况；另一方面，指出花鼓戏的观众都是“俗人”，即指在土垱一带劳作的黄孝帮人。^①

1900年（光绪26年）前后，汉口下游的沙口、水口等地茶园盛行，其中以“望江”、“贤乐”两个茶园较为有名。黄孝花鼓戏就在这些茶园中“挂衣”演出。演出剧目有《十里亭》、《送端阳》、《白扇记》、《大反情》、《小反情》、《雪梅观画》、《雪梅吊孝》、《何氏劝姑》、《蔡鸣凤辞店》、《喻老四拜年》、《张监生调情》等数十出。主要演员有黄官保、黄子云、杨蛤蟆、甘石生、陈彬卿等，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牡丹花（董瑶阶）年轻时也曾在沙、水口的茶园中唱过花鼓戏。

民国初期，花鼓戏受到汉口市政府的严格审查，花鼓戏被迫进入租界内的茶馆演出。1902年秋季，黄孝花鼓艺人组成“同庆班”，进入汉口租界三码头的清正茶园演出。使清正茶园成为在租界茶园演出花鼓戏的第一家。主要演出的剧目是“三个辞店四个楼”^②等60余出。主要演员旦角有黄和尚、余天保、许么、小炳杨、戴和尚、李品三（云中仙）等；老生有黄子云、陈彬卿等；丑角有周元、陈大山等。清正茶园自上演花鼓戏以来，生意极好，一般可卖300壶左右，轰动一时。于是，

^① 皮明麻、吴勇编著：《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199-200页

^② “三个辞店”即《蔡鸣凤辞店》、《胡变昌辞店》、《张德和辞店》，“四个楼”是《东楼会》、《西楼会》、《南楼会》、《北楼会》



各国租界纷纷效尤，如英租界的美观茶园、双桂茶园、春桂茶园、天一茶园；法租界的共和升平楼、玉壶春（后改为春仙、天仙茶园）、天声茶园（著名楚剧演员李百川、沈云陔都曾在这里演出）、文明茶园、福朗茶园、福和茶园、丹桂茶园、临汉茶园等；俄租界的东记茶园、怡红茶园；日租界的金谷茶园。这段时间里，汉口共有黄孝花鼓戏茶园 17 家。^①

演出花鼓戏的茶园之间的竞争，也促成了一批著名花鼓戏演员的诞生。如 1914 年玉壶春李百川的同庆班与共和升平楼的江秋屏各占一方，大出风头。1919 年，天仙茶园聘请陶古鹏、沈云陔进行竞争，于是，汉口涌现出了诸如江秋屏、李百川、章炳炎、江南蓉、王若愚、陶古鹏、姚如春、黄汉翔、沈云陔等一大批花鼓戏艺人。

早期的剧目比较简单，多以家庭纠纷和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角色只有小旦、小丑和小生；唱腔除小调外，主要由一人演唱、众人接腔的“哦呵腔”、“悲腔”、“四平”、“仙腔”等组成，只有锣鼓伴奏。黄孝花鼓戏在汉口的茶园中也成功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舞台布景的改革，从简陋的一个帐帘、四把椅子到挂上软片、外加附片，配上灯光效果；二是伴奏音乐的改革，20 年代初，章炳炎和陶古鹏在天仙茶园中共同研讨废除了人声帮腔和接腔而改为胡琴伴奏，在以后的演出中获得了观众的欢迎。

1926 年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在李之龙的主持下，才给花鼓戏以正名，并更名为楚剧。1927 年，陶古鹏率天仙班应聘，进入“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二楼首场演出。自此，楚剧纷纷走出茶园，进入剧场演出，使茶园萧条冷落。一部分茶园改为剧场，另一部分茶园则纷纷倒闭。

3. 汉剧、京剧

汉剧发轫于清乾隆末年，前期称“楚腔”、“楚调”，后期称“汉调”、“汉戏”，也称“二簧（黄）”。辛亥革命前一般称“汉调”，中华民国初年始改称为“汉剧”。

汉剧是湖北最主要的地方剧种，在形成以前，在江汉平原上已经过了近三百年的孕育。汉剧形成的标志，是皮黄腔系的形成，皮黄声腔又是由西皮腔和二簧腔融合而成。大致在嘉庆末年，西皮、二黄已经腔板俱全，成套的皮黄腔已基本形成，并在汉口形成了皮黄合奏的汉剧。清人叶调元著的《汉口竹枝词》中写道了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在汉口观看汉剧的演出情况：“曲中反调最凄凉，急是西皮缓二

^① 余文祥：《汉口的茶园与楚剧》载《武汉文史资料》1994 年第 2 期



黄”。

之后汉剧的发展很快，到了清末民初，汉剧戏班已经开始占据汉口的大部分茶园戏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汉口都市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流行娱乐形式。^①这时武汉的汉剧班社有 20 余个，演艺人员达千人以上。演出场所也由昔日的庙宇、会馆转入茶园和戏院。当时演出汉剧的茶园有天一茶园、满春茶园、长乐茶园、怡园、荣华茶园等。^②到了民国初年，汉剧已微露不景气的迹象。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汉剧在同楚剧的竞争中，已处于劣势，不断受到楚剧的挤压而走向衰落。

京剧传入武汉，要提到一位唱西北梆子的花旦演员五月鲜。五月鲜来到汉口，邀请徽剧“小班子”演员刘茂林，在长堤街建了一座简陋的茶园，称为“醉乐茶园”。他和刘茂林自任台柱，又在北京邀请来两位京剧名演员邱玉成和张胜奎。京剧也逐渐得到武汉人的欣赏，茶园生意比较兴旺。

不久他们又在沙坡地方（今汉口如寿里）开设了丹桂茶园，并由刘茂林赴京邀请来一个京剧班子。邀请京剧名演员想九霄（即田际云）主演《七星庙》和《双锁山》两剧，轰动武汉。后又在土垺（今汉口贤乐巷）开设贤乐茶园。

刘茂林与人合作在土垺前街（今花楼街笃安里）开辟天一茶园，邀请京剧名角刘永春和张国太。两个茶园形成竞争关系。

何继成在三元殿组建满春茶园，设备更加先进。并邀请了大名鼎鼎的谭鑫培来汉演出。谭鑫培在满春茶园登台演出京剧《汾河湾》等戏，观众如潮，场场客满。不久，天一茶园和贤乐茶园因为竞争不过先后歇业了。

买办江寿春集资在老特一区（今江汉路）创设群仙茶园，邀来上海京剧女演员林黛玉、王克琴等演出，这是京剧女演员在武汉演出的开始。之后他又将其改名怡园茶园。后还有咏霓茶园。民国后，京剧演出逐渐走出茶园走向专门的舞台。茶园这种茶馆与戏剧结合的形式也就逐渐消失了。^③

晚清演出楚剧、汉剧、京剧的汉口茶园一览表			
茶园名称	地址	开设年份	备注
丹桂茶园	大智门外如寿里（今天声街至一元路口一带）	1899	汉口第一家茶园，演唱京剧。一说这家茶园仅仅演出一个月即歇业。
天一茶园	花楼街笃安里（今中山大道永成里与厚生里之间）	1901	汪笑侬、余洪元等京汉名角曾同台演出。汪笑侬曾为大

^① 傅才武：博士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 1861—1949》，第 51—65 页

^② 郭贤栋：《湖北汉剧艺人与近代革命运动》，载《武汉文史资料》2006 年第 11 期

^③ 刘志斌：《武汉京剧的滥觞和发展》，载《武汉文史资料》2003 年第 10 期



			一茶园撰写嵌字对联：“天然图画，一曲阳春”。汉剧演员余洪元（末角）、赛黄陂（钟华卿、贴旦）、汪天中（丑角）等都曾在此演出。
满春茶园	满春路三元殿后	1902（一说为1905年）	可容纳观众2000人左右。辛亥革命时，黄兴指挥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曾以满春茶园为指挥所。获嵌字对联是“满地大兴革命，正驱除军阀，打倒列强，箪食壶浆，一路秋风悬露布；春光遍洒神州，仗菊部优伶，梨园子弟，金樽檀板，众仙同日咏霓裳。”汉剧泰斗余洪元、吴天保曾在此演出。
贤乐茶园	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贤乐巷	1902	后改名咏霓茶园
清正茶园	汉口华景街	1902	楚剧入城后的第一个演出场所
美观茶园	汉口花楼街	1903	
怡园（群仙茶园）	后城马路散生路口（今中山大道江汉路口）	1903	京剧坤班曾在此演出。1918年前后，汉剧名角余洪元、牡丹花（董瑶阶）、陈月仙、陈旺喜、高禄士、吴天保、汪大中、大和尚（李春森）、菊长胜等曾汇聚于此演出。
荣华茶园	长堤街土搜	1906	
同乐茶园	后城马路	1907	
玉壶春茶园	车站路辅堂里	1908	原名买春茶园
鹤鸣茶园	长订和（今汉口自治街）	1909	
福郎茶园	大智街附近	1909	
双桂茶园	汉润里对面	1911	
春桂茶园	汉润里对面	1911	
新民茶园	后城马路天津路口	1911	1919年改名美商人舞台

资料来源：武汉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文化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皮明麻、吴勇主编：《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3-194页



4, 评书、善书、大鼓

据已故评书老艺人田汉卿的口述资料,汉口开始有艺人说书,最早始于明朝末年。有一个叫柳敬亭的说书艺人曾长期在武昌等地说书,名震武汉,被南派鼓书艺人尊为“柳祖”。

袁公堤的修建,使汉口迅速繁荣起来,此时便开始出现了民间艺人挂牌行艺,为市民说书的现象。汉口评书在几百年的发展中,融合了北方评书、湖北评书、四川评书之长,自成一家,并形成了不同派别。到了清末民初,更是出现了许多评书名家,如杨云山、顾轩南、何星陔、林云卿(林小憨)、冯安子、任春山、徐桂庭、刘寿丰等人。以后还有所谓的“四杆旗”:童雪松、王端甫、李兰陔、夏秀峰;“三子”:王子林、李侠童(麻子么)、易子文;“三棠”:彭燮棠、陈锦棠、陈紫棠;“五将”:容宗圣、陈树棠、刘绍文、易子文、徐培之;“落地红”:江云卿;“三巨头”:李少霆、江云卿、刘金鹏等等。可以说是名家辈出。^①

民国时期,汉口的评书业非常活跃。汉口的懂春华茶社是有名的说书艺人演出之地。当时上演的书目有《三国演义》、《五女兴唐》、《粉状楼》、《义妖传》、《七侠五义》等包括纪事、言情、神怪、武侠、忠孝内容的题材。民国三十一年(1942)李少霆从汉阳县新沟镇来到汉口潘福记茶社演出,一炮走红,遂被书坛内外将他和江云卿、刘金鹏并列,合称“三巨头”。汉口评书艺人表演风格不尽相同:容宗圣以细腻著称,善说儿女情长;陈树棠社会常识丰富,对历朝典章、官职、制度颇有心得;江云卿以粗犷为特点。^②

同样,清末民国时期的茶馆中,还流行着说善书的文艺方式。所谓“善书”,“是由乡绅们撰写出来的一些规善惩恶、宣扬社会道德的文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也包含着通俗化了的儒家思想观念、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精神和说教。”^③正如其名,善书的内容多为劝人为善,夹杂着儒家的伦理观念以及佛道的精神。康熙九年(1670),朝廷颁行“圣谕广训十六条”,司命铎率各处绅耆于城镇诵解。湖北潜江人王文举就雍正二年(1724)颁行的“圣谕广训十六条”的题目,编写成《宣讲集要》一书,于每篇之首冠以圣谕,附加解释,根据不同的内容,每篇编写一个与之相应的故事演唱,遂开湖北善书之先河。道光后,湖北境内的善书

^① 万生鼎:《湖北评书的源流和流派》,载《武汉文史资料》1997年第2期

^② 《中国曲艺志·湖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志·湖北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0年第126-127页

^③ 侯杰:《清代社会文化生活研究的一项新成就——评游宇安博士的近著〈劝善金箴——清代善书研究〉》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



内容已由宣讲《佛海无边》、《毁谤遭遣》等内容,扩展到了宣扬社会美德,提倡正直善良,反对奸盗邪恶之“十全大善”及一些世俗故事。宣讲者也逐渐由乡绅耆老诵解,变为平民或艺人登台宣讲,逐渐地演变为一种曲艺形式。^①

善书的传播方式除了置于宫观寺庙、客场之外免费分发,或在集散贸易之地、街头巷尾、庭院坝子免费为人讲唱之外,一些说善书的艺人也栖身在了茶馆之中,利用茶馆作为说善书的场地,辛亥革命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湖北善书主要留传于汉川、天门一带,民国二十年(1931),湖北汉川县遭受水灾,大量善书艺人纷纷来到武昌或汉口的茶馆中讲唱为生。^②很多以宣扬“十全大善”相标榜的善书艺人,纷纷进入汉口。宣讲的内容也从“宣圣谕圣词”改为“消灾解危,讲道德说仁义”,宣讲听众喜闻乐见的“案”、“传”和俚俗故事。还创作、演出了一批反对社会恶习、反对封建婚姻的新书目,如《浪子回头》、《一口血》、《三槐魂》等。他们还创造性地将当时汉阳县蔡甸镇发生的轰动一时的余海子谋杀案编成善书“一口血”,连番宣讲,吸引了大批工人、苦力、小市民、家庭主妇、爹爹、婆婆等。据统计,1935—1948年,武汉有20多个讲“善书”的班子。^③

湖北大鼓流传于武汉、孝感、黄陂一带。形成于何时无文字记载。原有“北路子”、“南路子”之风格差别,民国后差别逐渐减少,并出现了“南北路”的新流派。

民国时期汉口市部分曲艺演出场所一览表

名称	地址	演出剧种	成立年代	消亡年代
万顺茶楼	汉口万安巷	评书	1925	1938
会仙茶社	汉口至公巷上首	评书	1934	1938
兰亭茶社	汉口花楼街	评书	1945	1952
四海春茶社	汉口硚口路	善书	1930	1949
即日兴茶馆	汉口宗关	善书	1925	1938
消洪森茶社	汉口硚口路	评书	1932	1945
泗海茶社	汉口自治一街	评书	1945	1964
吴瑞记茶社	汉口皇经堂	善书	1928	1965
李耀记茶社	汉口华清街铁路旁	评书	1930	1966
济生茶社	汉口前进二路	评书	1945	1965
黄天佑茶社	汉口自治一街	善书	1940	1949
楚风茶社	汉口汉正街	评书、大鼓	1938	1945
董春华茶社	汉口操场角	评书、大鼓	1928	1945

^① 《中国曲艺志·湖北卷》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2000 年, 第 7-8 页

^② 同上, 第 95 页

^③ “街头巷尾说善书”, 《江汉史话》, 王登福主编。武汉出版社 2003 年, 第 428-429 页



鸿春茶社	汉口满春路	评书	1930	1953
傅桂林茶社	汉口宝庆街	善书	1928	1949
福源茶馆	汉口清芳路	大鼓、评书	1930	1945
群乐茶园	汉口黄陂街	评书	1946	1949
谭清官茶社	汉口居仁门	善书、评书	1930	1949
潘福记茶社	汉口任冬街	评书	1928	1949
蔡顺泰茶楼	汉口汉正街太平巷口	评书	1930	1950
赢华茶楼	汉口三署街	善书	1930	1950

资料来源：《中国曲艺志·湖北卷》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2000 年版 第 693-695 页

有人认为，善书所提倡的道德观念，“贯穿于我国数千年历史之中，并不完全是为统治阶级神道设教而存在的，它们主体上还是全社会的公德”，这些“古老的道德准则在过去起到过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作用，到今天仍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用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①因此，民国时期汉口茶馆中善书这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同样对民国汉口市民社会的稳定和谐起着一定的作用。

5. 皮影戏^②、木人戏^③

民国时期汉口的茶馆中不仅上演汉剧、楚剧，还有电影、皮影戏等等曲艺形式。如据 1934 年《汉口市政概况》统计，当时汉口演出戏剧的茶园、茶社和茶楼共有 37 家，一些大的茶园茶社不仅上演汉剧和楚剧、皮影戏，而且还放映电影，如天一茶园不仅上演汉剧和楚剧，还放映电影；汉宁茶社上演楚剧，也放映电影；“满春”等 14 家都演楚剧；“琴鹤”等 20 家则专门表演皮影戏。^④这一方面说明一部分茶馆向剧场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茶馆作为城市市民的娱乐空间在不断扩大和改变自身形式以适应形式的发展。

清末民初之时，一方面汉剧、京剧、以及之后的楚剧，由于需要较大的场地，先后存在于茶园，后来又出现了独立的“戏院”“大舞台”等。皮影戏、木人戏艺人无法像京剧、汉剧一样进入到正规戏院唱戏演出，故往往出现在茶馆之中。

如一洞天茶馆在晚上 7—10 时表演皮影戏，也曾有评书艺人于此开讲《说唐》、

^① 唐人潮等注释《劝善书今译·导言》，转引自段江丽《善书与明清小说中的果报观》 明清小说研究 2002 年第 1 期

^② 皮影戏又称“影戏”、“灯影戏”、“土影戏”等，其舞台简单，只是一张平面的影幕，通过灯光透射，使紧挨影幕背面的半透明皮质偶人在明亮的影幕上显出影像，然后加上艺人的操纵和唱词进行表演，皮影戏的演出场地要求不高，故中小型茶馆成为皮影艺人演出的最佳场所。皮影戏也产生于汉代，在其自身历史发展中形成不同派别，湖北皮影戏属于川鄂滇影系。

^③ 即木偶戏，相传木偶戏起源于汉代，明清时期遍布全国各省份，支派繁多。湖北何时有木偶戏形式不详。

^④ 傅才武 博士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 1861-1949》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三国演义》等，还有一些女艺人在此演唱“武汉小曲”。清香茶社白天卖茶，晚上有时也挂衣唱戏，如楚戏、汉戏、皮影子戏等，老艺人朱瑞卿就经常在此登台演出皮影子戏，深受观众欢迎。

1931年，汉口市政府社会局对汉口市皮影戏、木人（偶）戏的演出情况的调查，发现仅在汉口市就有演皮影戏、木偶戏的茶馆 37 家。除去已停演的两家外，尚有 35 家，可见皮影戏和木人戏在汉口茶馆及时民中的影响。

汉口茶馆皮影木人戏一览表					
名称	种类	地址	负责人	批准日期	备考
品月茶社	木人戏	八元里	杨梅卿	1929 年 3 月	停演
听涛茶园	皮影戏	硃口外	严发源	1929 年 3 月	
德记茶楼	木人戏	三合里	黄德如	1929 年 6 月	
万寿春	皮影戏	济生南小路	匡立民	1929 年 7 月	
益顺茶楼	皮影戏	西马路	龚畅顺	1929 年 7 月	
李春和	皮影戏	刘家花园三马路	李春和	1929 年 7 月	
彩贤茶楼	皮影戏	济生四马路	董光前	1929 年 8 月	停演
新和茶楼	皮影戏	球场	陈明道	1929 年 9 月	
东海茶楼	皮影戏	济生南小路	张海卿	1929 年 10 月	
品海茶楼	皮影戏	球场	严品海	1929 年 10 月	
群记茶社	皮影戏	球场	朱宗荣	1929 年 10 月	
惠民茶社	皮影戏	济生南小路	江惠甫	1929 年 12 月	
迎春茶楼	皮影戏	球场	陈亮	1929 年 12 月	
万顺茶楼	皮影戏	球场	王兰亭	1930 年 1 月	
逸乐茶园	皮影戏	球场	吴义森	1930 年 1 月	
同兴茶楼	皮影戏	兴隆街	彭海清	1930 年 1 月	
汉流茶楼	皮影戏	大智门合兴里	王坤山	1930 年 2 月	
群贤茶楼	皮影戏	下太古麻阳口后街	章得贵	1930 年 3 月	
向延植	皮影戏	德华里	向延植	1930 年 3 月	
旭和茶楼	皮影戏	观音阁	高志旭	1930 年 6 月	
双福茶楼	皮影戏	洋火厂	李仁山	1930 年 6 月	
乐游茶园	皮影戏	陈家湖	张宏义	1930 年 6 月	
共和茶园	皮影戏	万年后街	陈明凯	1930 年 6 月	
王忠富	皮影戏	汉水街	王忠富	1930 年 9 月	
福安茶社	皮影戏	慎吕后街	柳英明	1930 年 9 月	
双和茶楼	皮影戏	双洞门	杨云卿	1930 年 9 月	
易云记	木人戏	三新街	易云记	1930 年 9 月	
洪兴茶馆	皮影戏	宝善堂	荣德海	1930 年 10 月	
文记茶楼	皮影戏	三善巷河街	刘友文	1930 年 10 月	



义记茶楼	皮影戏	花园巷	刘斌臣	1930年11月	
公记茶社	木人戏	府东三路	喻公记	1930年12月	
明汉茶楼	皮影戏	玉皇阁	徐保珊	1930年12月	
六合茶园	皮影戏	江岸下正街	卢育南	1930年12月	
同闲茶馆	皮影戏	日界兴隆街	王香山	1930年12月	
混世界茶楼	皮影戏	永清马路	黄正秀	1930年12月	
黄双全	皮影戏	桥口外	黄双全	1931年2月	
叶春记	皮影戏	万明街	叶福兴	1928年12月	

资料来源：《新汉口》第二卷第九期，民国二十年三月

根据这次调查的结果，汉口市社会局认为，这些皮影木偶戏市场规模大，但主要是在茶楼茶馆等地，主要的原因是“汉口影戏院剧场虽甚发达，但因取费过高，一般工人苦力，仍无法入场欣赏。……皮影戏木人戏在汉势力甚大，凡市内工人苦力均乐于观看，以其价廉。而趣味较低：适合脾胃也。惟固日此，此项木人戏或皮影戏设于所谓‘贫民窟’一带，或市内之茶楼上。”^①

第三节，近代汉口茶馆里的商业文化

根据现存资料，清末民国时期的茶馆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和交易场所。位于大火路的茶馆，就主要是为着各行各业议事和交易的地方，当时有民间歌谣就说：“大火路长又长，家家户户是茶馆，宾客进门茶一杯，笑问客人去哪方？不走东、不走西，找乡亲、会同行。”^②来到这些茶馆的就主要是园木业、竹篾业、红炉业等的商业和手工业者，茶馆在这里不仅仅是茶馆，它还起到了同业公会和同乡会的作用。如遇到当地每年元宵节玩龙灯，中元节的盂兰会，太阳节的太阳会等民间祭祀活动，他们都会利用茶馆聚会商议，集资筹办。

位于硚口路的德心茶楼，由于靠近汉水河边，河边来往的船民在靠岸后多在此休息喝茶，结算运费和结算粮款。一些粮食商人也利用茶楼来作交易。他们交易的方式也很特别，一般都是用袖笼打手势，暗语来谈价格，如一、二、三到十的数字，他们不明说，而是用牛、地、人、工、大、王、主、井、羊、非等字来代替，以便于不让外人听懂他们谈话的内容。其他一些行业的商人，如织布业的经手人和水、土、果行业的商人，以及一些肩挑负贩，一般也都选择在茶馆进行交易，在交易时，他们也往往操持一些只有他们本行业的人员才能懂的暗语。比如一至九的数字，织布业用的是：明、暗、聚、宽、拐、变、夜、问、梢这九个字代替；土、水、果业

^① 《汉口三十七家皮影戏木人戏一览表》，载《新汉口》第二卷第九期，民国二十年三月

^② 于福生：《硚口的吃喝两条街》载《武汉文史资料》1994年第2期



用的却是另外九个单字：如牛、月、汪、则、中、和、壮、利、秋等。^①

位于利济南路口的清香茶社，白天买茶，晚上有时有挂衣唱戏。到这里喝茶的一般是一些肩挑负贩，这些小贩谈话时也用暗语，他们用：斌、文、善、作、成、安、沔、柯、庆等九个字来代替一到九的数字。比如他们在见面时，一个人问另一个人说：“今天象么样？”另一个人回答说：“不好，只搞了‘文老’。”“文老”就是两块钱，当天的生意不太好，只挣到了两块钱。

一些作坊的老板当和工人出现矛盾，老板要辞退工人，或者工人向老板告辞、借支工资等等事情，也往往要到茶馆喝茶，谈判解决。

一些茶馆也成为某一行业聚会之地，如洞天居茶楼是一个妓院“老鸨”、老妈子多聚集的地方，她们称作“茶会”，如长怡里、华中里、联保里、三分里、四成里等处妓院的“老鸨”就常常聚集在这里，商讨问题。再比如荟翠茶馆，江浙帮的泥木作坊的工人常聚集在此，接洽伙计和商谈雇工。

第四节，茶馆里的秘密政治——茶馆里的帮会文化

近代中国的社会，有着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他们在正统社会之外形成了一种秘密组织，称之为帮会。如四川的“袍哥”，两湖地区的“哥老会”，以及“天地会”、“三合会”等等，都属于秘密帮会。这些帮会多产生于乾隆年间，清晚期势力扩展到全国，辛亥革命时期，曾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中一个重要的会党力量，势力发展最为鼎盛。^②帮会作为一种游走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异端组织，常常危及到政府的统治秩序，而受到当权者严密的搜捕和严厉的镇压。为了逃避政府的追捕，便于相互联络，帮会就常常以茶馆、寺庙、会馆等作为活动场所，掩人耳目。特别是茶馆，在帮会的往来交接、信息传达、组织传播以及日常娱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帮会在茶馆的长期秘密活动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手势、隐语、茶诗、茶碗阵等，从而构成了一种具有帮会色彩的茶馆文化。^③

近代汉口的诸多茶馆往往被湖北一带的青洪帮所把持。或是帮派中人直接开茶馆，或是茶馆老板有着帮会背景，成为清洪帮接头、处理帮会事务的秘密场所。如三十年代洪帮头头朱协卿开设的江南春茶楼，就是洪帮的一个“公口”茶馆，到这里喝茶的多为洪帮流氓。位于民生路上的荣华茶楼，也是帮会的一个“公口”茶馆，清洪两帮、清水（有职业者）、浑水（无正当职业者）常常在这里进进出出，是他

^① 田梅村：《旧时代武汉茶馆见闻》《武汉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1984（内部发行）

^② 郑东：《二十世纪初帮会的新变化》载《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

^③ 潮龙起：《近代帮会的茶馆与文化》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们摆“茶碗阵”的地方。茶碗阵是用茶杯、茶壶按照不同方式排列组合来表达一定意思的交接方法，帮外之人看到，根本不明其意。据朱琳《洪门志》记载，天地会的茶碗阵有四十二种之多，常常用各种古典小说、话本戏曲中的典故来命名，如“赵云救阿斗阵”、“桃园阵”等。^①各地帮会源于同根，所以“茶碗阵”的摆法也大同小异。帮会茶碗阵既是成员之间进行秘密联络的一种独特方式，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娱乐功能。如甲乙双方在茶馆对阵时，甲布一方，令乙破之，能破者为好汉，不能破为怯弱，这时就类似一种游戏了。

手势与隐语。帮会中人在进入“公口”茶馆时，为了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往往会使用一种与茶壶、茶碗有关的手势。中山大道的江南春茶馆的老板是洪帮头目，所以当洪帮自己人到茶馆喝茶时，会手捧茶壶，将壶嘴朝向自己的胸前，斟茶时，打手势三指半，连斟三下，茶房或“茶博士”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来了，局外人则不懂得是什么意思。这个暗语称为“凤凰三点头”。^②

吃讲茶：“吃讲茶”是帮会成员经常用来处理民间纠纷以及帮会之间纠纷的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切口语，“朋友”之间有纠纷而不能立时解决，就要到茶馆中“吃讲茶”。“吃讲茶”原是调解民间各种纠纷的一种形式，是同一阶层的人们相互认可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其原意是想用和平的方式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早在民间，这一风气就很流行。后来帮会也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帮会之间或内部的纠纷。在汉口，“吃讲茶”也叫做“叫散梁子”。洪帮地痞流氓在社会上寻衅闹事，不能解决的就到“公口”茶馆来“叫散梁子”。在众目睽睽之下，矛盾双方竭力申辩自己的观点，最后由大家决定，理亏的人要付茶钱。如果问题没有解决，就无人付账，壶嘴就都朝中间，等到问题解决之后，由会帐人收壶付账。

^① 潮龙起：《近代帮会的茶馆与文化》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 田梅村：《旧时代武汉茶馆见闻》武汉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984



第三章 茶馆——作为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

近年来,一些研究城市史的历史学者开始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研究茶馆,要首推美国学者王笛对四川成都茶馆的研究。通过对 20 世纪成都茶馆的考察,王笛认为,茶馆不仅是市民日常生活的舞台、娱乐休闲和商业交往的场所,同时还成为了社会政治运动的空间,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社会上层精英政权对茶馆改良的失败也表明了茶馆在城市生活中所具有的旺盛生命力。^①

从公共空间理论的角度出发,王笛的研究视角从茶馆伸向了城市的街头空间,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方向从精英人物向低层民众的转向。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通过“街头与城市商业(Street as Commercial space)”、“街头与民众日常生活(Street as Everyday space)”、“谋生街头(Making a living on the Street)”、“街头的节日庆典(Street as Ceremonial space)”、“街头改良(Changes in the Street)”,以及街头改良和控制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使城市街头文化转化成一种街头政治。^②他的研究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立体的近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画面,而且还为我们对茶馆等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范例。

所谓城市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本来是一个城市规划学上的概念,美国的城市规划学家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从人们的行为活动和城市形体环境关系出发,将城市空间分为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半公共空间和公共性空间。^③公共空间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公共性,也就是说不分等级贵贱,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一个空间。李德英给公共空间下的定义是:“城市公共空间是指用于人们消闲、娱乐、运动的公共场所,主要包括城市街道、广场、公园(public park)、公共运动场以及其他相应之地。”^④与西方城市中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相似的是,

^① 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Di Wang: "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 Modern China, Vol24, No.1(Jan,1998) pp.34-72

^③ Oscar Newman, Defensible Space, Phaidon Press, New York 1965, 51-57. 转引自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p127

^④ Oscar Newman, Defensible Space, Phaidon Press, New York 1965, 51-57. 转引自李德英《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城市史研究第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



近代中国城市中的茶馆也拥有着类似的公共空间的特点，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

按照 Perry Duis 对城市空间的分类，一是真正“公开”的地方，像上面所说的街道、公园等，二是私人所有，像私人住房等，三是介于“公”“私”之间的，可以称之为“半公共”（Semipublic）的地方，它们由“私人拥有但是为公众服务”，像欧洲的咖啡馆、沙龙，和中国的茶馆。^①因此，对于汉口城市茶馆的研究，可以从公共生活空间的角度来更好地了解近代武汉在大时代变迁中的社会冲突与变化。

第一节，帮会势力对茶馆的控制

从清朝以来，中国的社会中就活跃着一种秘密组织——帮会，其中以袍哥会和青洪帮势力最为强大。活跃在近代武汉地区的主要是青洪帮的势力，其中又以洪帮势力较为强大。洪帮在中国有 300 多年的历史，相传由南明抗清名将郑成功创立，早期的洪帮以反清复明为主题，到了清末，又提出了兴汉灭满，并参与了辛亥革命与武昌起义，成为其中重要的革命力量。之后被国民党政府特务组织控制和利用，成为社会黑暗势力的一部分，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沦陷后，一部分留在武汉的青洪帮分子也成为日本搜集情报、控制社会的汉奸工具。

青洪帮分子主要由乡村破产农民、城镇失业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以及流氓无产者组成。这些人都属于城市中的社会底层人物，三教九流、消息灵通，势力强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茶馆是一个门槛比较低的空间，低廉的茶资几乎不会把社会阶层中的任何人拒之门外。所以要开一家茶馆，如果没有黑道上的人做后台，几乎是不可能。对于处于社会主流政治之外的组织，这些帮会一般也都经营茶馆、餐馆、旅栈、戏园等行业，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主要职业活动。他们在各地开设茶馆，以此作掩护，开山立堂，发展组织，联络会众，沟通感情，互通信息，因此茶馆是帮会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如四川的袍哥组织为了便于联络，利用茶馆作为联络点，称为“茶哨”。在四川各乡镇集市，袍哥的公口、堂口一般都设在茶馆中。民国时期上海、江苏等地的帮会，也开设了很多茶馆，如常熟杨舍镇得仙园茶馆就是青帮头子陆瑞庭开的。^②

^① Perry R. Duis, *The Saloon: Public drinking in Chicago and Boston, 1880-1920* [Urb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p3, 转引自王笛《茶馆、茶房与茶客——一个近代内陆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微观研究》，中国近代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p294，2005 年

^② 潮龙起：《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



汉口的茶馆，基本上是被青洪帮控制。清末，青洪帮、哥老会成员的往来多在茶楼、酒馆之中，用“茶碗阵”进行活动，用隐语暗号来说明问题，并形成了一套茶馆中的帮会文化。赌博、吸食鸦片、贩卖枪支、拐卖妇女的交易也是在这里进行。青洪帮早已背离了最初的宗旨，成为社会中不稳定的一股力量。如在辛亥革命前，共进会的宣言中就讲到：“到了如今，我们的好兄弟，多半去赌博，或者去抢劫，问起‘反清复明’都茫然不解。”进入民国之后，由于这些帮会作为会党力量参加了辛亥革命与武昌起义，纷纷以“功臣”自居，大者窃国，中者霸产，小者就占房开茶楼、酒馆、旅社、客栈等。^①

当年在“茶客”中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就说明了这一点：“不是光棍，不开茶馆”。虽然开茶馆是项本小利大的买卖，但也是地痞流氓寻衅闹事的地方，茶馆的老板或者茶馆老板的后台一定要是青洪帮地头蛇，不然这个茶馆就难以长久。龙从起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如刘玉堂、刘桂苟、章庆澜、潘义，以及稍后的王贵和、黄辅臣、杨庆山、周汉卿等，都是先从茶楼、酒馆、旅社、客栈起家。

大革命失败后到三十年代，武汉的洪帮大爷们有“湖北王”——青洪帮头头何成溶的支持，牢牢控制了茶馆。不但茶馆老板与洪帮大爷有关，大茶馆的茶房头佬、“茶博士”等绝大多数也是“洪门”兄弟。

被青洪帮控制的一些茶馆：

味春茶楼：坐落在生成里口，先为陈汉卿开设，民初被稽查处督察长章庆澜霸占。

荣华茶楼：位于民生路口，是帮会的一个“公口”茶馆，青洪两帮、清水（有职业者）浑水（无正当职业者）都在这里进进出出，这是他们摆“茶碗阵”的好地方，以后也被章庆澜霸占。

武汉第一楼茶馆：老板姜秀山。

汉南春茶馆：开设在六渡桥口一座楼房的二三层上，洪帮大爷朱协卿是老板。

江南春茶楼：位置在中山大道民意一路口，是三十年代洪帮头头朱协卿开设的。

安乐泉：老板冷耀卿，洪帮分子。

得益茶馆：后花楼街和成菜场口，姓陈的“将爷”，是稽查处、禁烟督察处的“鸡杂鸭杂”每日必到的茶馆。

洞天居茶楼、一洞天茶馆：前者开在江汉路，后者开设在大智路与大智横路口，老板是洋务公所包打听李华山，他是靠英国人的势力，茶馆都靠近英租界。

保春茶楼：华景街菜场楼上，系汉留分子张春元开设，后来被周汉卿夺去，改

^① 龙从起：《也谈武汉的茶馆》载《武汉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内部发行，1985.1



为宁汉戏院。^①

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北的帮会分子渐渐为国民党政府所用,如抗日战争时期属国民政府“动员委员会”之下管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利用帮会分子从事特务活动,搜罗青洪帮分子成立如“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和“民治建国会”等组织。“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湖北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为张洛川,筹备委员有杨庆山、周汉卿、任建鹏等,书记是曹凯。“民治建国会”是中统控制帮会分子的外围组织,总会设在上海,武汉方面由易文州于1947年5月间邀集杨庆山、申子璜等发动筹备。秘密组织帮会和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勾结了起来相互利用,帮会利用特务组织作靠山扩展势力,称为“挂朵子”,即帮会头目想方设法去挂特务身份,武汉帮会头目杨庆山、申子璜、周汉卿都在稽查处、警察局、军统、中统挂了名;而国民党政府则利用帮会势力进行情报活动,20世纪30年代,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曾委派帮会头子杨庆山为行营侦察处长,利用洪门各山头建立情报网,大肆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所以这个时候的茶馆老板,往往身兼黑白两道两职,成为更加复杂的社会空间。

徐月楼茶楼:大智路铁路边,经理闵达斌为太华山分子,同时又是“中统”大智站成员。

高陞茶楼:韩家港,经理张汉卿为天目山字号大爷,“中统”成员

松柏茶馆:花楼街,经理罗松柏,“中统”大智站成员

海福茶馆:满春路,经理郭海福为太华山分子

益汉茶楼:球场街六大堆,经理陈辉益为天目山大爷,“中统”大智路站长

吴天楚森林茶楼:汉口旧民生路,经理李耀林为天目山大爷,“中统”小组长

②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花楼街的“得意茶馆”,是稽查处、禁烟督察处的“鸡杂鸭杂”每日早、中、晚必到之处。他们放在外面的“水客”(爪牙)将会回到这里碰头,并汇报搜查到的情报信息。方正里对门的苗景茶馆,则是警察局刑警队的茶馆,同样也是“鸡杂鸭杂”收集“水客”汇报的地方。保成路义成里口的荟翠茶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丹凤街(今江汉一路)的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稽查班长韩玉山、范明山、黄联宾等每日必到。

整个民国时期,汉口的大小小茶馆基本上都会受到青洪帮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政府与帮会的勾结,又使很多茶馆变成搜集情报、破坏进步势力、监控社会大

^① 《汉口的茶馆》 王登福主编《江汉史话》 武汉出版社,2003年,第423-428页

^② 莫元钦:《青洪帮与武汉》 载于《湖北文史》 2005年第2期



众的工具。

第二节，政府对茶馆的改造——思想文化的占领

民国政府对汉口文化娱乐场所包括电影、戏院、茶馆、游艺场的管理是一个探索和试验的过程。^①早期主要采取寓“管”于“禁”的原则，以警察厅为主，教育局协助，管制比较严厉，所以到1927年，在公安局的打压下，汉口的戏院、茶园等演艺场所营业都比较冷清。之后进行了改革，确立了社会、教育、警察三局共同管理文化事业的体制。茶馆作为为广大市民提供文化娱乐服务的场所，同样也受到民国政府的重视，特别是从自由交往和自由辩论的角度来看，茶馆更具有有一种西方社会中“公共领域”的特点，既是休闲娱乐的场所，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所以更受到政府的重视，进行了一系列对茶馆的改造措施。

1. 开设新的茶园

民国时期的汉口茶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被汉口市政当局和政治社会精英们认识到：“一般的市民，每天做完了事，差不多都要到茶馆休息、谈话、乘凉，因为茶馆是市民聚会最方便而最适宜的地方。”^②“但求一设备布置，寓有教育意义，足以熏陶民众心性者，实渺不可得。”^③

汉口特别市政府决定设立一种半官方性质的“民众茶园”，力图争夺这块对民众可以起到思想影响的阵地，以期达到对茶馆的规范引导和对市民的教化。所以，1929年，汉口市教育局鉴于市区茶馆鱼龙混杂，不能“熏陶民众心性”而“寓有教育意义”，决定“筹办民众茶园”，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倡休闲教育，给市民以正当娱乐、普通常识，期待改进其生活也。”^④“虽然到休息消遣的茶馆里去，也要使市民得到学问、知识、道德的增进，高尚的娱乐享受。”^⑤

汉口市政府将特一区三码头谈笑楼改为第一民众乐园，中山马路生成里口味春

^① 傅才武：《民国地方政府管理近代文化娱乐业的探索——以汉口为中心》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② 《文艺志资料选辑》一，内部资料，第72页转引自华中师范大学傅才武博士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第107页

^③ [市教育局]筹设民众乐园之经过《新汉口市政公报》第一卷第四期1929年10月

^④ 《文艺志资料选辑》一，内部资料，第75页，转引自华中师范大学傅才武博士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第107页

^⑤ [市教育局]筹设民众茶园之经过《新汉口市政公报》第一卷第四期1929年10月



茶楼改为第二民众茶园，硚口正街同德茶楼改为第三民众茶园，河街集稼嘴怡心茶楼改为第四民众茶园，汉阳东门外码头改为第五民众茶园。共设五所民众茶园，全部工作于九月中旬完成。

武昌市也于1929年设立民众茶园5所，分别于方言正街、水陆街口，黄鹤楼、草湖门外、火巷新街设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民众茶园。

2. 党化教育

哈贝马斯将近代城市的公共领域分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领域”，他认为，平民公共领域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参照，同时又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展现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解放潜能。^①近代的都市文化娱乐业都可以归入“平民公共领域”的范畴，它属于一种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②各国政治精英集团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他们具有整合、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的强烈动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要寻求对平民公共领域的文化领导权，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茶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公共空间，也就成为国民政府进行思想文化占领和宣传的重要阵地。

民国政府开办的民众茶园，采用公私合办的方式，选择一些“设备较优的茶馆”，政府给予补贴，使之具有公共教育和公共娱乐的性质。民众茶园内设有民众问事处，代写书信，代教读书，代做对联等，设书报阅览室，提供有益的通俗图书供民众阅览，设有民众游艺部门，教民众演唱有益之歌曲、戏曲，举行小型的音乐会、游艺会等等。

但同时加强对民众的党化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宣传，如规定民众茶园除具备桌椅茶壶等必需品以及上述公共娱乐设施之外，还必须备有党国旗、总理遗像等。茶馆内还要不定期进行各种党仪演讲和常识演讲，以茶馆作为对民众思想和信仰教育灌输的重要场所。

3. 对世俗文化的控制与改造

茶馆是各种民间曲艺天然的演出和传播场地。当政府开始对茶馆进行控制和改造的同时，也要对在茶馆内的文化传播进行改造和控制。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第8页

^②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第17页



如 1917 年元月 5 日汉口《大中华日报》报道：“春节期间，黄陂、孝感及黄冈等地藉酬神演唱花鼓戏，省长署为维持风化起见，训令各地知事，责成警佐协同团绅查禁。”1919 年 3 月，湖北督军兼湖北省省长王占元将中央教育部通令转武汉教育、警察两厅，“将近日武汉坊间所售及戏园所演各剧本，迅为查明，详细抄录。”1921 年元月，汉口警察厅第一区署长以“花鼓淫戏为法律所不许”为由，派警察前往“拿获花鼓戏伶”。1923 年 3 月，汉口警察厅厅长周际芸通知洋务公所转告法国领事馆，要求法租界禁演花鼓戏。1924 年 2 月 18 日，湖北省省长公署训令各县知事，农历新年期间，禁止玩灯赛会、演唱花鼓戏。12 月，汉口市政府交涉署要求法、英、日领事馆，汉口租界一律查禁花鼓戏。汉口市政府一直把花鼓戏视为洪水猛兽。直到 1927 年在李之龙的主持下，才给花鼓戏正了名，此后的花鼓戏也开始走出茶馆进入了正规的大戏院。

1934 年由市政会议通过了评书艺人的等级规划，开设评书艺人训练班，并成立评书改良研究会，对评书的书目进行审查，对书场、茶楼进行观察，并对艺人提出了“态度和蔼，接近群众；严禁呆板，隔离群众”的要求，发出了“勿举动轻浮，有失信仰”的告诫。

第三节，茶馆业的自身管理——汉口茶馆业同业公会

同业公会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普遍成立的新式工商行业组织。这种工商行业组织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行会（或者说是从传统的行会向现代行业组织发展变化的一个标志），它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工商同业团体，是一种现代性、开放性和公益性的同业组织，这种组织的职能主要是实行行业管理、规范同业经营行为、维护行业发展，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进行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重要市场中介组织。^①

同业公会作为商会的基层组织，数量很多，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很重要。截至 1934 年，武汉依照同业公会法组织成立的工商同业公会共计 159 个；全国截至 1933 年 6 月，21 个省市向国民政府实业部备案的工商同业公会共计 4185 个。^②

汉口茶馆业同业公会是汉口市茶馆行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市场平衡而成立

^① 对“同业公会”组织形式的介绍与分析，具体可参看 朱英《同业公会——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5 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理论月刊 2004.4

^②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 人民出版社 2003，转引自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理论月刊 2004 年第 4 期



的组织，成立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1930年），“查本会于十九年十二月成立时，蒙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派监选员罗香才监选。当选主席胡桂森，……亦未呈请备案，故前社会局绝无档案可稽，惟二十年二月常务主席胡桂森因病辞职，公推候补执委朱渭卿继常委兼主席。尚有二十年二月六日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临时整理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第四三五四号准予备案之指令可证。……”^①

第一届茶馆业同业公会成员共十六人。制定了《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章程》，在汉口市篮子正街14号设立了事务所，以处理茶馆业同业公会中的事务。成立当时并未在政府备案。

根据公会章程内容，凡是汉口市的茶馆都自然成为该公会的会员，并要派代表出席同业公会的会议，凡是茶馆业同业公会的会员茶馆，都必须遵守该公会的章程，服从决议案之义务，并交纳一定的会费。茶馆业同业公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会员大会，全体会员代表参加；平时以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和执行机关。执行委员十五人、监察委员五人，分别组织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另有候补执行委员七人和候补监察委员二人；然后再由执行委员互选三至五人为常务委员并就常务委员中选任一人为主席；所有选举均采用无记名民主选举。委员的任期为四年，每两年改选半数，不可连任；常务委员出现缺额时由执行委员会补选。

茶馆业同业公会于民国二十三年和民国二十六年分别进行了改选工作，“案据汉口市政府呈称：……驻鄂特派绥靖主任公署指令‘准予开会’；……并派本府职员陈华潜前往兼选。”^②“准咨送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改选。”^③“案据汉口市政府廿六年六月十六日呈以据该市茶馆业同业公会呈称：‘本会于本年四月廿八日于长堤街安徽会馆……举行第二次改选大会，蒙钧府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派员莅临监选指导，依法抽签决定留任、信选各委员……造具第二次改选委员会名册，会员名册，请核查备案等。’”^④

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第二届当选委员名册：

职务	姓名	店名	地址
主席	郑世新	世界第一楼	大智门
常务委员	朱协卿	汉南春	中山路
	汪福堂	中业	同上

^①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三十日 第八二五八号案 实业部 一宗 湖北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卷

^②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三十日 第八二五八号案 实业部 一宗 湖北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卷 武汉档案馆

^③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湖北省政府 咨 湖北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卷 武汉市档案馆

^④ 茶馆业同业公会资料 湖北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卷 武汉市档案馆



执行委员	屠玉山	歆生阁	江汉路
	韩春山	春山	中闸口
	周汉卿	宁汉	华清街
	田礼堂	高升	清芬二路
	高自明	明记	杨家河
	余守运	沧海	紫竹巷
	江秀山	第一楼	中山路
	李禹卿	洞天居	江汉路
	萧焱卿	三镇	正街永宁巷
	罗蘭轩	蘭轩	新汉正街
	但植夫	植荣	熊家巷
	涂傅伯	鸣鹤	河街永宁巷
候补执行委员	陈小山	中信	新安市场
	林良栋	临城	中山路
	左启华	凤台	万寿宫
	周德元	德心	硃口马路
	何永康	清泉	硃口
	刘肇东	鸣园	硃口外
	李德旺	同德	汉正街
监察委员	雷志卿	话雅	民生路
	闵福山	得月	大智门
	丁开文	品香	三新街
	贺鸣泉	鹤阳	府南一路
	冯贡廷	怡心	集稼嘴
候补监察委员	李玉山	野圃	居仁门马路外
	罗谷侠	龄鹤	广益桥

正式与候补委员共二十九个。根据本年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共有会员茶馆 450 名。

（资料来源：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资料 武汉档案馆 BF25/237）

茶馆业同业公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合法经济组织，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维持并促进同业之公共利益”、“解决同业会员间之纠纷”、“矫正营业之弊害”、“接受党部政府及商会委托之事件”。^①

马敏在谈到民国时期出现大量的同业公会时曾指出，“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大量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明晚清时期出现的萌芽状态的‘市民社会’似乎到民国时期并没有完全消亡，尽管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但留给社会的活动空间还是很大。庞大的同业公会网络同样把活动范围扩大到了政治、外交、社会

^① 《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章程》 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卷，武汉市档案馆



经济活动的各方面，与固有的商会系统遥相呼应，成为‘市民社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①引进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来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程，取得了很多成果，当然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究竟“市民社会”的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在这里暂且不谈。根据马敏的分析，同业公会作为一种处于国家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活动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空间之中，与商会系统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发展的佐证。但是在对汉口茶馆业同业公会文献的分析中，我们却可以感觉到所谓的汉口茶馆业同业公会并非像一种纯粹的理论如此简单，里面包含着复杂的权力之间的争夺和斗争。

(1) 政府对茶馆业同业公会的控制：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同业组织的法规。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次年又公布《工商同业公会法施行细则》，一方面强调了同业加入公会的强制性，规定“同业之公司行号，均得为同业公会之会员，推派代表，出席于公会。”同时还对同业公会的组织架构作了统一规范。^②从一开始就在不断加强对同业公会的控制，并且把同业公会作为进一步控制社会各个行业的中间组织。所以严格的说来，同业公会并非一个纯粹的由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成立的民间组织，而是严格的受到官方政府的控制，这与西方的所谓介于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公共领域”所指不尽相同。在《汉口茶馆业同业公会章程》中明确提出了该公会要办理的一项事务是“接受党部政府及商会委托之事件”。在几次改选时，同样要受到政府派遣官员的监选，“驻鄂特派绥靖主任公署指令‘准予开会’，……并派本政府职员陈华潜前往监选。”“查本会于十九年十二月成立时，蒙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务整理委员会民众训练委员会派监选员罗香才监选。”^③

(2) 帮会势力的渗入控制：洪帮和青帮本是清末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到了民国时期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武汉最大的黑社会势力。对汉口的政治、经济、文教、社会、新闻出版等事业有着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凭借着辛亥革命时期的功劳进入政府各机构，另一方面牢牢控制着社会下层民众社会空间。朱协卿、周汉卿等都是汉口洪帮势力的头子，同样也进入到了茶馆业同业公会委员会。

^① 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载《理论月刊》 2004年第4期

^②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 人民出版社 2003，转引自马敏《中国同业公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理论月刊 2004年第4期

^③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三十日 第八二五八号案 实业部 一宗 湖北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卷



结 语

中国有着悠久的饮茶传统，中国的茶文化也源远流长，但是这些文化的流传往往蕴含着文人趣味和精英传统。对于作为世俗文化、民间传统文化的储存场所——茶馆的研究总是被人们所忽略，对于很多人来说，茶馆只是一种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场所，而没有看到隐藏在茶馆中的多层次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不过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历史研究对社会下层文化的重视，已经有人开始了对茶馆和茶馆文化的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从早期的政治史，到近些年的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隐含着一种转向，即从宏观历史研究转向了微观史的研究，从精英文化转向了下层民众文化、街头文化、世俗文化的研究。这些转向在城市史研究中比较明显，特别是王笛及其他一些历史学者对城市茶馆、公园、戏院、街头等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成果都佐证了这一观点。历史的研究，正是在新的理论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角度的不断变化中才能获得更大发展。我正是在此驱动下，决定了将研究的对象定为汉口的茶馆。与王笛对成都茶馆研究的不同，我在将汉口茶馆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同时，更注重了汉口茶馆的文化，将对茶馆的观察与近现代汉口市民的生活结合起来，从茶馆这个小舞台看汉口这样一个大世界。本文并不奢望有何开创性的成果，只是希望能够为城市下层文化研究、茶馆文化研究提供铺路基石，成为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一条注脚。

本文通过对近代汉口茶馆文化的研究，一方面鲜活了近代汉口的城市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近代汉口茶馆中的丰富生活：各种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层次、不同职业的汉口市民，在工作之余，不仅可以去逛戏院、看电影，更可以到不同档次的茶馆中喝一杯清茶，与朋友聊聊天，听听评书大鼓等民间曲艺。另一方面，对于近代茶馆的功能也有了更多了解：茶馆为人们提供饮茶、憩息、休闲场所；为人们提供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为各种经济活动提供场所；成为各种信息的传播空间；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世俗文化的储存器和传播机；孕育和掩护秘密政治活动的空间；城市下层民众的“执法”中心；艺人小贩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

当然，对近现代汉口茶馆的研究，还可以注意到对于现代茶馆发展的借鉴意义。

汉口的茶馆，不像成都的茶馆始终保持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性。汉口的茶馆在民国经过多次天灾人祸的破坏，建国后的政治改造以及其它历史发展的原因，出现了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繁荣之后，汉口才又出现了各样的茶馆。据武



汉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统计,1995年,全市工商注册的茶馆茶楼和改换门庭招牌的茶坊茶肆多达500多家,其中汉口的茶馆数量不仅占全市总茶馆数量的70%以上,而且规模档次也更高。十多年後的今天,这个数字肯定会更多。现代武汉的茶馆装饰,或用金属装饰材料,豪华气派,或用红木立柱雕栏,古色古香;或引进日本韩国的茶馆风格,各具特色;茶具器皿更加精巧考究,茶叶更加高档。汉口台北路口的“大亨小传茶寮”,三阳北路的“明白人”茶坊,武汉客运港下的“茶圣殿”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这些茶馆舍弃了旧时茶馆的一些糟粕,赋予了社会文明进步及其需要的一些新的内容,但是我认为当代茶馆仍然不能丢弃的特点就是,它仍然要成为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空间,茶馆的改造和建设仍然不能丢弃传统文化,丢弃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茶馆的精髓。茶馆档次的提高、服务质量的提高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值得警惕的就是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世俗文化的隔绝。另一点就是与民众特别是普通市民的隔绝,近代的汉口茶馆,茶资低廉,对于普通汉口市民来说,喝茶就如同一日三餐一样普通,即使是到茶馆中欣赏各种文艺节目,也不会占用更多的收入。当代茶馆已经在逐渐失去这种传统,变的过分商业化、追求奢华和档次,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我觉得,这也是现代汉口城市中茶馆无法像成都那样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传统茶馆的多元化经营同样也是现代茶馆应该借鉴的经营手段,如茶馆中的各种特色饮食、茶艺表演、文艺表演、教育展览等,从而还促进了休闲产业的发展。

现代茶馆还可以在商务活动方面谋求经营发展。传统汉口茶馆中有着丰富的商业文化,行业内部以及各行业之间的贸易往来往往放在茶馆中进行。像一些咖啡馆一样,茶馆内同样可以设立商务空间,为许多商业人士洽谈生意提供场所,与饭店酒吧相比,这里更加安静、儒雅和自然,在加上茶的生理作用和文化暗示,更能促使人们头脑清醒、心平气和地洽谈生意。

由于客观原因和个人的水平有限,文章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首先,由于近代汉口茶馆史料的缺乏,对汉口茶馆文化的探讨并不能完全展开。武汉沦陷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汉口的茶馆史料,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找到的资料较少,文章内容基本定在1800年至抗战之前的一段时间。希望以后有机会寻找到相关的材料,对论文做补充。

第三,汉口为什么不像成都、广州那样保持了茶馆文化的延续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也很有意思的论题。我也很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些研究,只是由于时间、精力和金钱有限,成为了一个遗憾,希望以后能够弥补这个遗憾。

第四,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文章中肯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纰漏。



参考文献

一、史料部分

1, 《武汉市志》: 2 卷《大事记》, 10 卷《城市建设志》, 22 卷《文化志》, 23 卷《新闻志》, 27 卷《人物志》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2, 《武汉文史资料》(1-3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内部发行)

3, 范锴著 江浦、朱忱、饶钦农、胡锦贤释《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4, 《夏口县志》(民国编著) 中国地方志集成

5, 《汉口小志》(民国四年 1915 年) 中国地方志集成

(以下史料来自武汉市档案馆)

6, 民初汉口竹枝词今注

7, 汉口市政公报

8, 汉口市茶馆业同业公会资料

9, 汉口民国日报

10, 汉口市略图

11, 新汉口市政公报

12, 新汉口月刊

二、著作与论文

著作

1, [德]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年

2, 何一民 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3, 王玲 著《中国茶文化》北京: 中国书店 1997 年第 3 版

4, 皮明麻 著《武汉近百年史》湖北: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5 年



- 5, 徐晓春 主编《中国茶文化》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 6, 苏云峰 编《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9)——湖北省》,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 1981 年版
- 7, 皮明麻 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8, 周育民 邵雍著 《中国帮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9, 章开沅、罗福惠著《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
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3
- 10, 皮明麻 著《汉口五百年》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1, 刘易斯·芒福德 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 12,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 译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 13, 王先明 著《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 14, 李明伟 著《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论文

- 1, 熊月之 《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 档案与史学 1996.6
- 2, 熊月之 《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学术月刊 1998.8
- 3, 李德英 《公园的社会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 史林 2003.1
- 4, 李德英 《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生活:以近代城市公园为例》
城市史研究 第19辑
- 5, 王笛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历史研究 2001.5
- 6, Di Wang “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 Modern China, Vol 24, No.1 (Jan, 1998) pp.34-72
- 7, 王笛 《茶馆、茶房与茶客——一个近代中国内陆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围观研究》 中国近代史论集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8, 王笛 《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 历史研究 1996.1
- 9, [日]铃木智夫 《清末江浙地区的茶馆》 江海学刊 2002.1
- 10, 潮龙起 《近代帮会的茶馆与茶文化》 江苏社会科学 2003.3
- 11, 刘礼堂 《论唐代长江上中游地区的饮茶风习》 江汉论坛 20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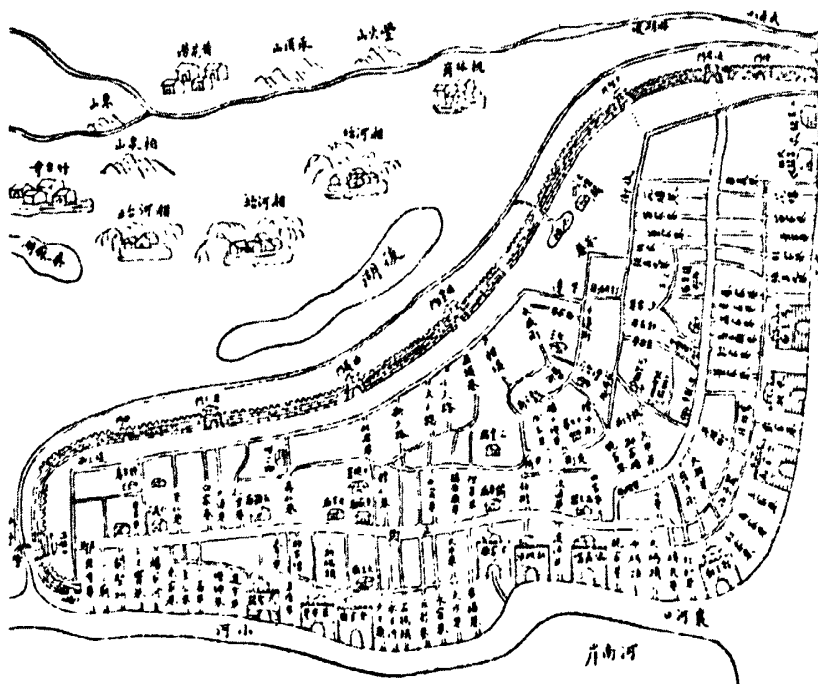


-
- 12, 李晓南 《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看今昔茶馆文化的变迁》 社会科学辑刊 2004. 1
- 13, 刘学忠 《中国古代茶馆考论》 农业考古 1995. 4
- 14,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吕卓红 2003 年博士学位论文《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与变迁》
- 15, 陈峰《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江汉论坛 2002. 11
- 16, 皮明麻《近代武汉城市人口发展轨迹》 江汉论坛 1995. 4
- 17, 莫元钦《清洪帮与武汉》 湖北文史 2005. 2
- 18, 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江霞 2004 年硕士学位论文《明清至近代武汉游憩地研究》
- 19,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傅才武 2004 年博士学位论文《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以汉口为主体的中国娱乐业近代化道路的历史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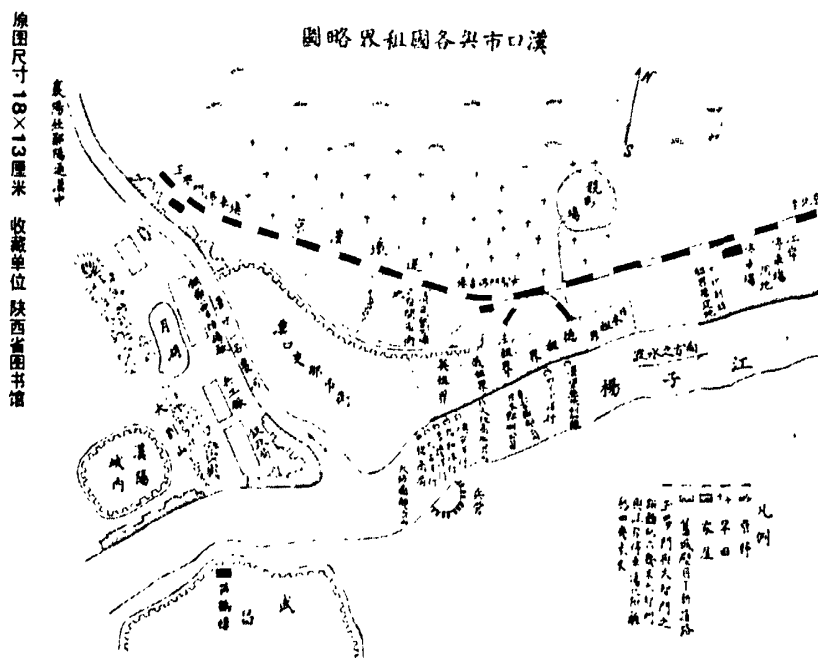


附录

1, 1866 年 汉口市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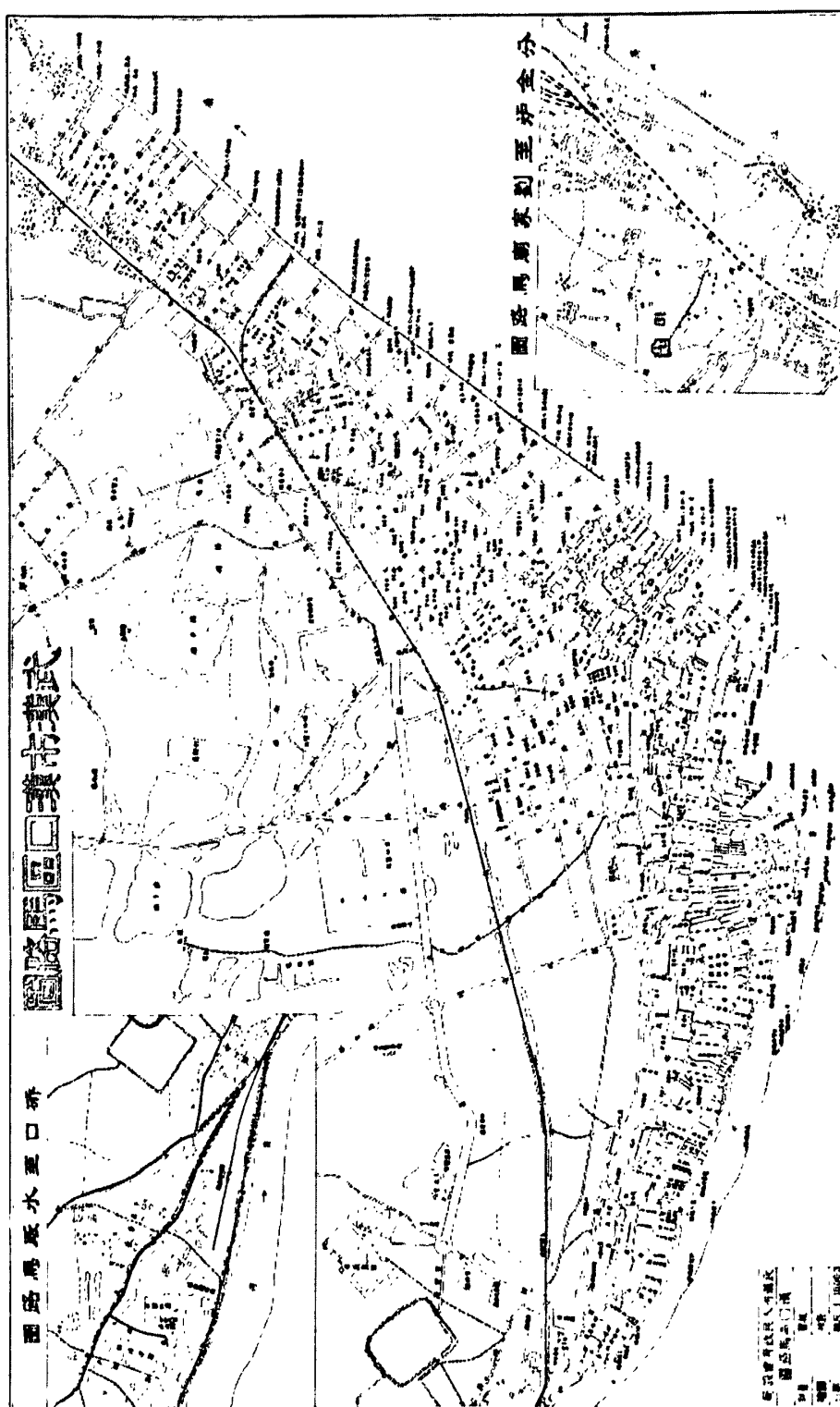


2, 1908 年, 汉口市及各国租界略图





3, 1951年, 武汉市汉口区马路图





后 记

带着一些遗憾，终于决定将论文交付定稿了，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落地，又觉得似乎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到这里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有很多感慨，但沉默是金，低下头来看看内心，昂起头来面对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之所以选择汉口的茶馆作为研究对象，最初是因为王笛的茶馆研究吸引了我。他对成都茶馆的研究让我隐隐感觉到了历史的不同写法，过于理性的历史研究论文总是让我厌倦，只有那些充满了想像力和生活情趣的文章才更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有时也总是在思考，历史研究究竟为了什么，究竟哪样的历史研究才是真正其本身。当然这不是我能够回答的问题。总之他的研究引导着我开始了对近代汉口茶馆的考察，这个过程是辛苦和快乐的，每次找到一则小小的史料时我都会欣喜若狂，想起“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词句。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导师罗福惠教授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和鼓励，从选题到收集资料以及行文布局，罗老师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广阔的思想维度都给了我很好的启示和帮助。在这里我要首先感谢我的导师，在这三年来，正是罗老师的悉心教导和殷切关怀，让我走过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三年来他们给了我许多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如今他们又增添了几丝白发，我只有以后更加努力的工作去报答他们。我要感谢我的女友姜平平，在我写论文和找工作期间，她一直给我安慰和鼓励，帮我走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最后，我要感谢在我困难时候帮助过我的：胡年珍书记，饶水利、李永、周彦等好朋友，阳毅、肖国刚等老室友，张泽建、周飞、刘宁宁等老朋友。

寥寥数语，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此搁笔，愿美好的生活继续。

代亚松
2007年6月